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 书集选译

护教学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基督教神学：在伦敦大学学院基督教协会发表的一系列演讲》

原著：沃尔特-沃伦-西顿

原著出版日期：1903年

《基督教神学： 在伦敦大学学院基督教协会发表的一系列演讲》

沃尔特-沃伦-西顿

约翰-默里，1903

=====
=====
=====

前言

我希望，除了许多外国人和英国人都表示希望看到这些文章付梓之外，这些《基督教辩证法演讲》所引起的兴趣，尤其是开尔文勋爵在第一次会议上的演讲，以及随后在《泰晤士报》上引起的争论，足以成为将其出版成书的理由。

这本书是伦敦大学学院基督教协会委员会于 1902-3 年夏季学期在植物剧场宣讲的。

起初只是为本学院的男学生准备的，随着计划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决定向伦敦所有学院和医院的男女学生开放。

我们希望英国大学基督教联合会的其他附属联合会今后能更多地

关注这一重要学院工作分支的发展。

令人欣慰的是，牛津、利物浦和伦敦的其他学院已经在考虑开设类似的课程。

我借此机会代表委员会感谢同意出版其作品的演讲者、协助主持会议的先生们以及麦克拉伦先生，他不仅提供了导言，还提供了附录，其中包含六篇演讲的摘要，这对学生们会很有用。每位作者只对自己的部分负责。

大学学院基督教协会。

沃尔特-W-西顿、

荣誉秘书。

1903 年 10 月。

=====
=====
=====

导言

关于基督教证据的性质和范围

作者：W. W. D. McLAREN.

我们认为，在向学生和公众介绍以下演讲时，最好对基督教证据的整个领域进行鸟瞰，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每篇演讲的适当位置。这不仅会提高这些论述的价值，还会为进一步的探究提出建议，甚至有助于加强或建立对基督教信仰整体合理性的信念。

这种信仰的本质在于，耶稣基督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拯救者，他将我们从罪的统治和后果中解救出来。个人信仰就是对他的依赖。基督徒的证据涉及这种可信性的证明。它们并不直接针对建立个别或系统的教义，正确地说，这些教义是这种可信性的具体应用。然而，这些真正展现基督思想的教义或体系可以成为证明他值得信赖的证据。证据的目的也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仅是为了确定《圣经》的神圣起源或权威、真理或准确性；尽管很明显，对《圣经》内容的仔细研究和比较必须始终是基督教证据的主要内容和方法，而且，凡是能普遍证实《圣经》教导的，都会倾向于证实有关基督可信性的特别记录。然而（除了一个很大的例外），它们也不仅是针对神迹本身或任何特殊神迹的确立。这一大例外就是基督的复活，它表达并印证了基督的可信性。然而，消除对神迹的反对很可能有助于接受直接证据。证据也没有直接指向对

上帝的信仰或对罪的承认，这两者都是在发现值得信赖的基督时给出的。当然，对上帝和罪的真实感确实会促使人们相信基督的可信，但这并不是基督教证据的直接目的。

在明确了这些证据的目的之后，我们就可以结合三个问题来考虑它们的内容了。(1) 作为一种有效的工作假设，这种信任是否有经验为证？(2) 它的起源故事是否自洽？(3) 它是否与其他已知事实或真理相矛盾？对于实用性、自洽性和对于普通人的认知体系来说，这就是检验真理的三个标准。

(1) 在运用第一种检验标准时，我们会发现基督教辩护士会用大量的数据来回答，这些数据都是从信靠基督对处于各种环境中的人的生活所产生的所谓影响中收集的。对经历过这种影响的人来说，证据通常是完整的，至少在目前是这样；而对许多人来说，通过观察和见证所了解到的他人生活改变所产生的影响，即使在个人的信靠没有立即与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也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这种证据是绝大多数基督徒所依赖的。威尔士先生在《演讲》第四章和所附的几篇演讲中都谈到了这一点。反驳者通常试图证明，基督教的良好效果是由于对基督的信任之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或者这种信任在对虚幻的基督和对真实的基督行使时同样有效——简言之，基督教是一种巨大的催眠错觉。基督教经验的普遍性和多样性这一事实大大驳斥了这种不信的解释；尽管如此，许多人心中仍然存在着怀疑的因素，他们甚至犹豫是否要从非基

督教的角度来解释他们自己假定的基督教经验，这就迫使人们去探究基督教产生的故事的真实性。对基督教经验本身的思考使我们有必要这样做。因为这种经验自称所面对的不是推测的或捏造的基督，而是一位活生生的基督，它与历史中的基督是一致的。

(2) 福音故事自洽性的证据可以从其形式、内容和目的三个方面来考虑。形式方面的证据包括：各种叙述之间不经意的一致；作为检验是否存在串通或伪造的标准的差异度的价值；目击者和耳闻者的蛛丝马迹等等。在考虑实质问题时，除了真实性的原因（如拉撒路复活带来的凯旋式进城）之外，很难解释公认的事实，也很难脱离相关的神迹来解释教义；但这部分证据的高潮在于对基督本人的描绘，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让探究者相信，它展示的是真实而非虚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尔戈柳斯教授的演讲才显得极其重要。在这一类中，包括了所有对不相信的故事解释的反驳，如我们在第六讲中发现的寓言、欺诈或虚构，以及伪经书所提供的对比。在考虑目的的情况下，我们将从以下方面进行论证：基督的言语、行为、榜样和历史是否适合实现他所宣称的使命目的——即把人从罪中解救出来，使他们重新获得上帝的眷顾和形象。这种自洽性证据的次要部分在于基督教教义的内在和谐，表明基督在其对人灵魂和人类的各种职责中是值得信赖的。这些考虑也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下面的第三类证据。

第二类证据的重要性在于，它使人确信福音历史的客观真理，而

且它似乎与对所谓的基督徒经历（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的解释所产生的疑问无关，对它的研究，既使许多人对基督产生了个人的信任，也使在困惑的反省和哲学的不确定性中失去的信任得以恢复。但是，如果把经历与历史事实的关系考虑进去，人们就会觉得综合起来的证据更加令人信服：历史事实中的基督使心灵中的基督变得易懂；心灵中的基督使历史事实中的基督变得可信；经历承认历史是它的起源，历史承认经历是它的目的。

(3) 仍有一类人的心灵得不到满足，因为他们无法确信任何所谓的事实或真理在人类知识的总体体系中的地位。即使是那些通常对福音历史和自己的基督徒经历的真实性的真实性感到满意的人，也会有智力上的探索和不确定时期，在这些时期里，问题会迫使他们思考基督教是否与其他领域已确定的知识相矛盾，以及在我们所知的宇宙中是否真的有基督教的存在空间。对于这些问题，基督教的证据在消极方面可以反驳其他知识提出的反对意见，在积极方面可以表明基督教与其他知识的和谐。

在这一点上，亨斯洛教授第一篇演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而韦斯院长的演讲也有相当一部分涉及这一主题。韦斯院长指出了历史与《福音书》中基督所不可动摇地认可的第一部犹太书籍之间的和谐关系。类似的考虑还涉及《旧约》、《使徒行传》，尤其是《福音书》的重要叙述部分与其各自时代的历史条件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从《旧约》和《新约》的文本和

历史评论中获得的证据，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此外，这些考虑还具有哲学意义，因为我们试图证明《圣经》的历史意义不仅要承认福音故事是现代生活的兴起，而且在基督教的光照下，它获得了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提供的意义和目标。同样，我们可以以大自然的进程为例，试图说明它的普通顺序表明了神的信实、规律和圣洁，但并不排除基督徒信仰中的非凡事件，这些事件相应地表明了神的仁慈。大自然不是僵硬的机器，而是造物主的律法和恩典的可塑圣物。同样，哲学思想的历程也可以被证明是与福音相一致的。曼利先生在第五次演讲中的论述，以及对其他宗教和哲学体系的思考，都属于这一范畴。我们发现，基督教无意中融合了这些宗教和哲学体系的精华，另一方面，这些宗教和哲学体系的自我救赎和绝望的教义与基督救赎的教义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福音在道德上符合人类的需要，对上帝和人的内心都有至高无上的了解，这些都构成了福音在哲学上的终极理由，并自然而然地将人们的思绪再次引向个人对福音力量的体验问题，从而将理智的说服与对良知和心灵的呼唤结合起来。

可以说，基督的复活（威尔逊先生在第六次讲话中论述）集中和象征了所有各种形式的证据，并触及了其他每篇讲话的要点。它是构成基督徒经验的超感官影响的开始和起源。它是基督教故事在形式、内容和目的上的圆满结束。它是世界历史上的最高事件，是大自然的神圣起源和可用性的印证，也是对哲学家的探究和心灵深处对人的意义和命运以及上帝的品格的渴求的回答。因为基

督在其中被视为生命和灵魂的赐予者。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讲话的顺序与上述顺序正好相反：它们以有神论的重大问题开篇，首先是原始的、然后是充分发展的神圣启示的书面记录，接着考察了它所创造的基督教经验，并在第五篇讲话中再次提到作为基督教真正替代方案的无神论立场。威尔逊先生的第六篇讲话反驳了对复活的不信解释，向我们提出了个人实践的最后问题。

从这一总体方案的全面性可以看出，证据的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向每个人介绍适合其气质、条件和需要的论证部分。在这里，一些新教基督徒可能会明智地从耶稣会士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例如，一味强调实践证据，只会激怒而非帮助那些正确地要求或需要历史证据的人，而历史证据不能满足哲学探究者，哲学也不能满足那些一心追求实际满足的人。明智的辩士会使自己的论点适应同伴的需要，而不是适应自己对某一思路的偏好。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基督教辩护士们甚至会相互蔑视对方的努力，而不是为对方的努力而欢欣鼓舞；许多恳切的基督徒在诉诸心灵和良知的幌子下完全鄙视推理。基督教护教学的“证据使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承认理智在基督教信仰中的适当地位以及基督教护教学各部门之间相互依赖的好处。在探究者方面，即使是最合适的介绍也可能会被偏见所排斥，有时是智力偏见，如科学或哲

学的某种特殊理论被允许排除任何相反的考虑，有时是道德偏见，如不愿意接受基督的主张（如果成立的话）。另一方面，探究者若有对上帝和罪的现实的敏锐感知，会使他们倾向于接受所提供的宽恕、更新和永生。

坚定的追寻者也最好记住，他所需要的产生信仰的证据也许就在他容易忽视或只是肤浅地研究过的那个部门里。在许多情况下，粗心或偏见会延长疑惑的时间。

通过对《基督教证据》的目的和内容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它们的构成。它们的力量足以证明，个人依靠基督获得解救是灵魂的最高理性行为；但却不足以在没有实践的情况下迫使人们在思想上同意。否则，在证据太少的情况下，这种冒险即使不是不道德的，也是非理性的；而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仅仅表示同意是没有道德意义的（因为不需要人的道德与信心）。因此，基督本身既是基督教证据的主体，也是其客体，并成为检验标准，因为他自称是精神品格的评判者。他将自己赐给了所有属他的人。伦敦大学学院基督教协会安排并出版了这些讲座，正是期望一些人在仔细探究后能够做出这一至高无上的冒险（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1903年8月

当今理性主义

附

达尔文主义研究

作者：REV. G. HENSLOW教授，M. A. ， F. L. S. ， F. G. S. 等。

当今的理性主义大概可以从“理性主义报刊协会”发行的各种刊物中看出来。这些出版物涵盖了广泛的研究领域。要讨论不同作者所论述的所有主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有一点可以将当今的理性主义与“七十年代”的旧世俗主义区分开来，当时布莱德劳夫先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就是，至少有些作者将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的所有现象，无论是生理现象还是心理现象，都归因于自然选择。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自然选择》出版于 1859 年；而当时的世俗主义者在他们关于自由思想等的著作中没有使用自然选择；这些著作通常包括拒绝接受任何教会的神学教条，以及对上帝信仰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因此，布拉德劳先生写道：“无神论者不是说‘没有上帝’，而是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上帝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上帝这个词只是一种声音，并不能传达明确或清晰的肯定含义”。

以 R. P. A. 为代表的现代理性主义的主要目标如下：

“本协会的主要目标是鼓励和传播以科学和批判性研究为基础的文学作品，使人类理性从单纯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并在不断增长的知识素材中得到适当的发挥”。

“理性主义者”对于“理性主义”的定义如下：

“理性主义可定义为毫无保留地接受理性至高无上地位的精神态度，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可由经验验证的、独立于一切武断的假设或权威的哲学和伦理学体系”。

到目前为止，这是一种合理、科学的态度，没有人能够对这些目标和这一定义提出异议；但问题是，该协会发行的书籍的作者是否实现了这些目标或符合这一定义？他们是否从不依赖于“武断的假设”或不容置疑的“权威”？

由于这些作者将他们的不可知论——在某些情况下是明显的无神论，如海克尔（Haeckel）——建立在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这也是我将其添加到本演讲标题中的原因。

下面是一些典型的理性主义作家的引文，他们把一切都归因于自

然选择。

贝尔福先生的《辩证法》的匿名作者在谈到“科学”时说：

“科学要求最严格的调查”，“揭示所有现象的自然原因”。

但在地球生命的成因、化学亲和力的成因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科学并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科学仍然牢牢地植根于经验这块坚不可摧的土地上”，因为“知识只能通过观察获得，并通过实验加以纠正和验证”。

我特别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基于归纳证据的知识，在这位作者身上是明显缺失的。如果“观察和实验”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手段，那么大部分公认的科学结论都将不得不放弃。因此，现在没有人质疑地球自转给我们带来昼夜这一“事实”；但对太阳的“观察”显然支持相反的结论。人们只接受归纳证据，即积累了大量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对真理的道德信念，相当于一种证明，使除了太阳和星星在二十四小时内环绕地球运行以外的另一种说法变得绝对不可想象。地球自转的真理并不在“观察和实验”的范围之内。

同样，当这位作家要求证明上帝的存在时，他说：

“科学既不肯定也不否认上帝的存在。所谓[上帝]的知识必须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如果它是知识，它就能够在被验证，而科学对这个问题的裁决必须是最终的”。

“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关于上帝的知识如何才能被纳入观察和实验的范围呢？但是，既然科学完全满足于归纳证据，而归纳证据是不可能的，那么理性主义者不接受归纳证据作为造物主存在的证据就是前后矛盾的；因为在自然背后有一个全能的心灵的可能性的积累就像、或远远大于，比如说，太阳光谱中的吸收带与蒸发元素的相应色带之间的巧合等；然而，所有物理学家都完全愿意接受我们的元素存在于太阳本身的可能性这一事实，尽管他们没有机会将太阳的炽热蒸气提交给观察和实验。

有人说，信徒对上帝的信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信就是证明未见之事”，而这正是科学中所谓的归纳证据。

英国理性主义者似乎和布拉德劳一样，主要是不可知论者。他们不说“没有上帝”，但有神论者认为充分的“证据”似乎对他们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们将看到，原因在于他们接受达尔文主义，认为达尔文主义可以解释一切。

因此，当贝尔福先生作为《辩证法》一书的作者在讨论人类心理

学时，他使用了自然科学的观点，选择其作为解释所有心理现象的一般工具。例如，“根据人类智力是通过自然选择过程为实用目的而进化的这一理论，人类智力的能力符合我们的预期”。“理性是事物的屋顶和冠冕；它是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的最终结果”。但它不属于“观察和实验”的范围。

然而，最新的自然选择学家说：

“人类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有机体，无法确定自然选择是否存在”。

如果要问这些理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如此强调自然选择，答案似乎是，撇开他们自己的定义不谈——他们接受达尔文主义为既定事实，接受达尔文为“权威”，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来源可以解释生物的所有现象。

现在，让我们以海克尔为例来说明唯物主义或他所说的一元论立场。与不可知论者不同，他说：“无神论肯定没有神，也没有女神。这种无神的世界体系与一元论或泛神论基本一致。二元论把宇宙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即物质世界和非物质的上帝。．．．一元论承认一种唯一的物质，它同时是‘上帝和自然’。它认为身体和精神或物质和能量是不可分割的”。

关于唯物主义一元论，他与理性主义者一样，将达尔文主义视为对所有现象的根本解释.....：

“达尔文给了我们解释有机体一元论的钥匙。．．．．只有机械论才能给我们对自然现象的真正解释；因为它将自然现象追溯到其真正的有效原因，即盲目和无意识的机构。康德说‘不可能用不受设计控制的自然规律来解释一棵草的起源。’70年后，达尔文完成了康德认为不切实际的任务”。

同样，毕希纳说：“达尔文主义是唯物主义和一元论的主要支撑。”

这是达尔文自己的观点吗？在《物种起源》等第六版（1878年出版，对1872年作了增补和更正）中，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生命及其多种能力最初是由造物主赋予几种形态或一种形态的，这种观点是伟大的；当这个星球按照固定的万有引力定律，从如此简单的起点开始，无穷无尽的最美丽、最奇妙的形式已经并正在演变”。

他在《人类的后裔》（1871年）中还写道：

“物种和个体的诞生同样是一连串宏大事件的一部分，我们的大脑拒绝接受这些事件是盲目偶然的結果”。

请将上面这最后一句话与我从海克尔那里引用的话——即“盲目和无意识的机构”——进行比较。

在达尔文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著作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很快就会显现出来，那就是他们在应用自然选择方面往往远远“超过”达尔文本人。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著作和《驯化中的动植物》只涉及生物的进化，他把生物的进化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1）少数或一个原始生物的最初创造；（2）变异的存在，他说，没有变异，自然选择就无能为力。

如果这些假设成立，那么自然选择就是进化论的原因。但是，有些作家试图将各种内部组织解释为自然选择的结果；不仅是人类的精神现象，甚至死亡本身也在自然选择的支配之下。

M. Léon A. Dumont 评论说，达尔文的理论在德国被接受时，“一开始，没有人认为达尔文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不仅是自然科学，而且还将其延伸到更多的领域，如语言科学、智力培养、政治、道德、历史、进步理论等。达尔文主义及其应用在这个国家（德国）诞生了各种文学”。

关于人类，达尔文在《人类的后裔》一书中主要关注的是人类身体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过程，而对人类的心理只作了如下观察：

“道德品质的提高，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更多的是通过习惯、推理能力、教育、宗教等的影响，而不是通过自然选择”。

然而，贝尔福先生的《辩证法》却毫不犹豫地将人类的感官、理性、审美能力等归功于自然选择。而且，除了将人类心理学建立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之外，我们还看到，海克尔和毕希纳还将他们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建立在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尽管达尔文自己也明确宣称他相信造物主，正如我们在上述段落中所看到的那样。

我们现在必须对达尔文主义进行研究，必须将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仔细区分开来。达尔文主义是一种解释进化过程的理论，其书名就是《物种起源之自然选择》。达尔文告诉我们，这是他在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想到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指出，人类以几何级数繁衍，但他们的食物供应量却以算术级数增加，在任何特定的有限地区，总有一天会有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亡。因此，体弱多病者、患病者和贫困者等将首先被自然淘汰，而强壮富裕者将被自然选择。

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动物和植物，达尔文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动

物和植物的出生率很高，而死亡率几乎相等；因为在任何确定的地区，其数量的平均水平每年都在保持不变。

死亡的原因多种多样。很大一部分后代，如鱼卵，被其他动物吃掉了。运气不好，或者达尔文所说的“偶然的毁灭”，是造成许多后代死亡的原因。至于植物，营养良好的种子会生长。

我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探究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其过程并不十分清楚；因为栽培植物（如小麦）和驯养的动物会像人一样以几何级数繁殖。但是，在一个有限的地区，例如英国，如果没有任何外来援助，人口也会增加，但面积却不会增加；如果这个地区被完全耕种，它只能提供固定数量的动物和植物食物。

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力较强的植物会不断生长，而生命力较弱的植物则会被淘汰。事实上，“生存斗争”是激烈的，不仅在相互竞争的动物和植物之间，而且与周围的自然条件等有关。一般的后果是，只有平均数才能生存。

但是，最强壮和最幸运者的生存与构成新变种基础的新结构变异的出现毫无关系；因为除了那些使幸存者成为“最适于生存者”的原因之外，这些变异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

如果这一过程是自然选择，那么自然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就像许多

作家所说的那样，根本没有任何力量或作用。正如达尔文所坚持的那样，这只是一个比喻。因此他写道：

“有些人甚至想象自然选择会诱发变异，而自然选择只意味着保留在其生活条件下出现的、对生物有益的变异。．．． 还有人反对说，既然植物没有意志，自然选择就不适用于它们！毫无疑问，从字面意义上讲，自然选择是一个错误的术语；但有谁反对过化学家谈论各种元素的选择性亲和力呢？有人说我把自然选择说成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或神灵；但谁反对过一位作家把万有引力说成是行星运动的主宰呢？每个人都知道这种隐喻式的表达是什么意思和含义”。

达尔文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错误是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引入了“结构”或“形式”元素；在《物种起源》第 63 页中，他并不关注这一特征。从来没有人证明，结构或形态的微小变化，或所谓的“个体差异”，与个体的死亡或生存有任何关系。达尔文的第二个错误是把“个体差异”视为自然界各种差异的根源。例如，一棵树上没有两片叶子的形状是完全相同的，就好像它们是像印花鱼纸一样被剪在一起一样。豆荚里的两粒豌豆也没有绝对相同的。所有这些差异都被系统学家所忽视，因为它们缺乏变种和物种的两个基本特征，即足够大的差异，以证明使用“变异”和“品种”这两个术语是正确的、以及遗传的恒定性。

A. R. Wallace 博士区分了“特异性和非特异性或发育性特征”：

“后者[相当于个体差异]是由决定生物体生长和发育的规律造成的，因此很少与物种的界限完全吻合。”

不难理解达尔文为何将个体差异视为变异的来源。这是因为他的理论基于对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观察，而对野生动植物的观察则少得多。例如，让我们以萝卜为例。我们发现，作为一种野生植物，它的形态是恒定的，没有变种，但在人工培植的土壤中，根部变成了纺锤形或球形；通过对种子的精心挑选，现在有几种“形态”可以遗传。所有这都可以被称为“夸大的”个体差异，但不是“变种”。

胡萝卜、卷心菜、雪莉罂粟等都是类似的例子。因此，达尔文说，既然对人类有用的变异无疑已经发生，那么在伟大而复杂的生命之战中，其他有用的变异也会发生，这难道不可能吗？

在下一页，他指出：“生活条件的变化带来了变异性增加的趋势。……除非出现这种有利可图的变异，否则自然选择就无能为力”。例如，野生胡萝卜、卷心菜、田间罂粟根本没有产生过其他野生品种；尽管可以推测，没有一株植物没有个体差异。因此，在英国，小白兰 (*Ranunculus Ficaria*) 从来没有变异（在系统学家看来），但它在马耳他却长得很大，被称为变种 *Calthafolia*；

不过，由于马耳他的植物都是一样的，自然选择也就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

许多观察家认为达尔文的“个体差异”为植物的起源提供了材料。《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对数以百计，有时甚至数以千计的同类个体进行了研究，并将所选器官的差异，如小白兰花的萼片和花瓣，螃蟹、蠼螋、虾等的甲壳长度或宽度，用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曲线表示出来。但这只能说明，任何器官的生长过程都不是绝对相同的，这可能取决于营养的偶然差异。重要的问题是，它们会导致发现变种的起源吗？

据我所知，观察者们并不总是首先注意寻找“变化了的生活条件”，而是从同一地点收集个别标本。其次，他们似乎忘记了，除非具有遗传的恒定性，否则任何特征对于分类都是不重要的。品种的这两个基本条件似乎并不是在每种情况下都能得到充分关注，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如此。

一位来信者告诉我，他发现欧洲南部的玛丽金品种的射线小花数量因其栖息地而异。因此，21 是典型的数量；但在靠近海边的地方，则会增加到 26 ($= 2 \times 13$) 和 34。在科莫湖，牛眼菊一般有 21 个射线小花；但在海拔 400 至 500 英尺的地方，它在盛花期长出 34 个小花，花期结束时又恢复到 21 个。

这种变化显然是由于“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当然，这些数字很容易用植物轴突原理来解释。

达尔文假定的第二个变异来源，是他所谓的“不确定的”变异。他认为，当种子或幼小的动物在变化的生活条件下成长时，它们的规律是“无限”变化；也就是说，有几种变化，有些是有利的变化，有些是有害的变化。结果是，少数被自然选择，其余死亡。据我所知，达尔文或任何达尔文主义者都没有提出过野生植物或动物在自然界中发生这种无限变异的例子。

此外，假设存在这种不确定的变异，那么生存斗争发生在萌芽阶段；也就是说，至少在植物中，通常在任何变种或特定特征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发生了。因此，如果梨树是用种子培育出来的，那么在花朵和果实中出现任何变种特征之前几年，就必须进行斗争，并确定生存者。

如果有人断言，梨的新品种特征（可能要在播种后十年才会出现）与多年前婴儿期的存活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提出过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达尔文将人类的选择与自然选择相提并论；但这两个过程在性质上截然相反；因为人类的选择是将他希望保留的个体隔离开来，他根本不允许它有任何挣扎。在自然界中，生存应该是通过激烈

的生存斗争来实现的。但就我们所知，自然界并没有两种制造变种的方法。

同样，自然选择常常被作家们说成是一种“媒介”或拥有“力量”。其实，它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它就像“自然法则”，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则”，而只是一个短语，表示在类似情况下总会发生的事情。

自然选择代表以下事实。生下来的生物太多了，无法让所有生物都能活下去。这是自然法则，因此大多数生物死亡，少数生物存活。仅此而已。多数生物死亡的原因和少数生物存活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但达尔文坚持认为，自然选择只是表达这一事实的一个隐喻。

现在有必要说明达尔文主义被视为无神论一元论的主要支持者是如何形成的。达尔文通过自然选择解释了物种起源。他说：“如果一位建筑师不使用切割的石头，而是从悬崖底部的碎石中挑选楔形的石头做拱门，拉长的石头做门楣，平整的石头做屋顶，建造出一座高贵而实用的建筑，我们应该钦佩他的技艺，并把他视为至高无上的力量。现在，石头碎片虽然对建筑师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与建筑师建造的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就像每个有机体的波动变化与其经过改造的后代最终获得的变化多端、令人赞叹的结构之间的关系一样”。

然而，用这样的材料建造一座“高贵的大厦”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达尔文没有提供任何砂浆。正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先生所说，除了最原始的人之外，没有生物用石头建造过房子。

但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石头与房子的要求不是“相同”，而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们根本没有为房子做好任何准备。同样，根据达尔文的观点，偶然出现的“波动的有利变化”与生物体的要求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并不存在将这种变化与生物体的适应形式联系起来的自然法则。

自然界中存在的“规律和秩序”总是吸引人类将之作为“心灵”的证据，而不是“盲目的偶然”；如果达尔文主义是正确的，那么一元无神论也许会有一些合理的依据。

在达尔文关于人类眼睛的论述中，达尔文认为，眼睛可能是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产生的，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想象的假设，而所有这些假设都必须通过自然选择来解释。以下是他的描述。

达尔文写道：“如果我们一定要把眼睛比作光学仪器，我们就应该想象出一层厚厚的透明组织，其间充满液体，下面有一根对光线敏感的神经，然后假设这层组织的每一部分的密度都在不断地缓

慢变化，从而分离成不同密度和厚度的层，相互之间的距离也不同，每一层的表面形态也在缓慢变化。此外，我们还必须假设有一种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的力量，始终密切关注着透明层中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并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每一个在不同环境下以任何方式或任何程度趋向于产生更清晰图像的透明层。我们必须假定，仪器的每一种新状态都会以百万倍的速度递增；每一种新状态都会被保存下来，直到产生出更好的状态，然后旧的状态就会被全部销毁。让这一过程持续几百万年：每年都有几百万个不同种类的个体产生；我们难道不能相信，这样就能形成一个活的光学仪器，它比玻璃仪器优越，就像造物主的杰作比人类的杰作优越一样吗？”

赫胥黎把达尔文主义描述为一种“试错”方法，但这种描述完全不适用于自然界的所有其他部门。万有引力定律、热定律、电等等；那么，为什么在建造无数生物，让它们完美地适应其生活条件，包括人类自身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达尔文主义被视为对有神论的致命一击，这几乎是不足为奇的。

由此可见，要揭露理性主义者、海克尔一元论者或唯物主义者的不合理之处，就绝对有必要揭示达尔文主义的谬误。

那么，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替代方案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为“真

正的达尔文主义”，因为达尔文本人以及自然选择都是这样提出的。

欧几里得将其命题建立在公理之上，而“真正的达尔文主义”则建立在两个这样的公理之上。

第一个公理是“变异性”——即所有生物体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变化的能力或力量。

其次，原生质和细胞核中蕴藏着一种能够对外界影响做出反应的力量。它们可以通过这种力量构建细胞、组织和器官，以应对和直接适应生命的条件。

达尔文是这样描述这一过程的：

“条件变化的直接作用导致确定或不确定的结果。．．．在前一种情况下，生物体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受到特定条件的影响时很容易产生变化，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个体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改变”。

“如果没有自然选择的帮助，一个新的亚变种就会形成”。

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我们这里有一个自然法则，管理着产生的变异与改变的生命条件之间的关系。

由于所有个体的变化都是一样的，自然选择也就无能为力了。他所说的“不确定的结果”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有确定的结果。

当然，大多数个体（即任何物种在新条件下的后代）会死亡，少数个体会存活下来。这可以说是自然选择的应有之义；但这一事实与新的变异特征毫无关系，死的和活的都一样拥有这些特征。

如果达尔文的假设是正确的，造物主将生命注入一个单一的形体，或制造了一个带有细胞核的原生质小点——目前，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像细胞核这样复杂的结构是如何产生的——那么，这个小点就足以演化出整个动植物世界，包括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我们对这一现象进行反思，就会发现原生质实际上被赋予了一种创造性的无所不能！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大自然背后存在着一种无所不知的力量。

有很多理论可以解释原生质体起源于原有的无生命物质。

除了这种普遍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同样普遍的“指向性”，它利用化学物理力量制造所有生物；但仅靠这些力量并不能解释有机结构的适应性。

因此，整个进化论就是在这两个公理原则或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展开的。

1876年，达尔文意识到环境的“直接作用”作为进化论的主要原因或解释的重要性。他在给慕尼黑的瓦格纳教授的信中写道：

“我现在认为，我犯的最大错误是，我没有重视食物、气候等因素的直接影响，而这些因素与自然选择无关。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以及后来的一些年里，我找不到环境对物种直接作用的有力证明。现在，这样的证明比比皆是”。

当然，这些证据在1859年和1876年一样“多”。但事实上，它们是普遍存在的。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自然法则。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达尔文主义”或“适应法则”是对进化论的真正和唯一的解释，它取代了旧的“设计论”。达尔文主义“假定神的工作原理与制造者或工匠的工作原理相似，制造者或工匠首先构思出一个想法，然后设计并绘制出一个计划，最后按照计划建造出机械装置。”

同样，人们认为植物和动物的所有适应性都是在被创造之前就预先设想好的。

进化论颠覆了这一过程。任何事物的产生，最初都不是预料到它的用途或需要。

适应法则

必要的结构是通过生物对环境的反应行动进化而来的。在动物中，努力和使用是获得肌肉和其他器官的手段；而眼睛则是通过光对敏感原生质的直接作用，在直接作用下慢慢进化而来的。

这种自我适应环境力量的普遍过程——“没有自然选择的帮助”，正如达尔文所说——在人们的心目中，作为一种神圣的、创造性的力量或思想的不容置疑的证据，比设计可能做的要强烈得多。

因此，对造物主的信念是建立在大量的个别可能性基础之上的，这些可能性如此之高，以至于对于任何能够接受归纳证据的头脑来说（而不是无端地局限于“观察和实验”），这些证据都是压倒性的。

从这个词的一般应用来看，后者无疑是正确的。科学通过观察、实验，在无法进行实验的情况下，从纯粹物理和可观察到的自然事实中归纳证据，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替代理论——即变异的起源是环境的明确作用——可以从 66 个丰富的“事实”中推导出来。这是一个纯粹的科学结论。

但是，除了科学所能教导的一切之外，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现象，正如其他参与讨论者所指出的，科学无法触及。这就是原生质体的反应能力的原因，通过这种能力，新的变化得以产生。在生物体中存在着一些不适用于晶体的“东西”。明矾或其他矿物的分子总是以相同的形式存在，而且一直如此。但动物和植物却不一定如此。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指向性”，但又有所不同。生命世界中的这种“东西”，是在纯粹的化学物理作用力之外添加的。它从何而来？因此，当我们回顾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史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个体差异或甚至是变异，而是各种奇妙的适应性，这是这种直接性下的反应能力的结果。

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发现人类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调整；有时是模仿大自然的巧妙安排，有时是事后发现大自然已经阻止了他。

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是智慧的结晶，因此他得出结论，大自然的作品也是智慧的结晶。

但是，人类在开始创作艺术作品之前必须先进行构思和设计，而

自然界的作品则是通过自我调整的进化过程产生的；但是，只有当环境的“直接作用”唤起原生质的反应能力时，原生质才会开始工作，建立起所需的结构。这是根据“大量”归纳证据得出的严格符合逻辑的结论。

生命结构的所有现象都可能符合自然规律，也可能是通过自然手段——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是化学物理手段——实现的；但是，尽管生物学家们尽量忽略这一点，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某些生命现象逃脱了他们的“观察和实验”能力；变异的起源就是其中之一。

正如一位作家所暗示的那样，从原生质细胞核的行为到人类的进化，“指向性”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指向性是一种普遍的自然规律，无处不在。它甚至是一个实验问题，也是一个观察问题；因为在栽培和驯化过程中，它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称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含义。旧时的“生命之灵”、“万物之灵”、“药物之灵”等称谓无疑是有缺陷的，但其中蕴含着生物学无法触及的真理。就拿“药力”来说：生物学能用纯粹的化学物理力量解释伤口为什么会愈合吗？

“力”本身是不可知的，只能通过它们各自的作用来认识，如电、

磁等。那么，正如 Jas. 克罗尔 (Jas. Croll) 在谈到生命现象时说过，生命现象也只能通过其特殊效果来识别——把它们看作是“生命”力的结果，就像说到电力或磁力一样，是有道理的。在这一点上，开尔文勋爵同意他的观点。

如果仅凭化学物理力无法实现生殖和遗传，那么为什么不把它们称为“生命力”呢？“生命力”是在指导原生质分子构建婴儿的“方向性”作用下产生的。

科学家可能会说，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们的研究范围。也许是这样，但为什么哲学不能进入科学不愿涉足的领域呢？

以下是开尔文勋爵的讲话，他的讲话引起了《泰晤士报》和其他媒体的大量报道。

开尔文勋爵的演讲

关于亨斯洛教授提到的醚粒，我请求允许我说三句话，即个人解释。最近，在爱丁堡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我有机会使用了以太、原子、电等词语；当我从报刊上读到我提出了以太原子的假说时，我感到非常震惊。醚绝对不是原子；它没有结构，在不受可思物质、原子干扰的地方完全是均质的。

我完全赞同亨斯洛教授演讲的基本观点；但我不能承认，关于生命的起源，科学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创造力。我们不是在死物中生存、运动和存在的，而是在科学迫使我们接受为信仰条款的创造力和引导力中生存、运动和存在的。当我们研究周围活的和死的物质的物理学和动力学时，我们无法逃避这个结论。我相信，现代生物学家再次坚定地接受了一种超越单纯引力、化学力和物理力的东西；这种未知的东西就是生命原理。在科学中，我们面前有一个未知的物体。在思考这个对象时，我们都是不可知论者。我们只在上帝的作品中认识他，但科学却绝对迫使我们满怀信心地相信一种指导性的力量——一种物理力、动力或电力之外的影响。有些人认为西塞罗是卢克莱修的编辑，他否认人、植物和动物是由原子的偶然结合而产生的。在对创造力的绝对科学信仰和对原子偶然组合理论的接受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只要想一想，一些原子是自己落在一起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晶体、一枝苔藓、一个微生物、一个有生命的动物”。西塞罗所说的“原子的偶然结合”并不是完全不适合晶体的生长。但是，现代科学界人士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这种说法对于生物体内分子组合的产生、生长或延续来说是完全荒谬的。在这里，科学思想不得不接受创造力的观点。四十年前，我在乡间某处散步时，曾问李比希，他是否相信我们周围的草和花仅仅是靠化学力量生长的。他回答说：“不相信；就像我不相信一本描述植物学的书能够仅仅依靠化学力量生长一样。对于物理、化学和数学科学来说，人类自由意志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一个奇迹。”

在亨斯洛教授的整个讲座中，自由思想的健康、微风拂面的氛围令我钦佩。不要害怕成为自由思想者。如果你的思想足够坚定，科学就会迫使你信仰上帝，这是所有宗教的基础。你会发现科学与宗教不是对立的，而是有帮助的。

最后，我谨向亨斯洛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有趣而富有启发性的讲座。

=====

=====

=====

=====

作者：坎特伯雷院长（亨利-韦斯牧师，博士）

关于《创世记》，有一点我有幸向大家谈谈，这一点实际上得到了所有作者的认同，无论他们的批评观点如何。这一点就是《创世记》的写作意图是统一的。这个目的就是揭示上帝与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关系。这本书为我们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套关于遥远时代的世界和人类历史的杂乱无章的记录。它不仅仅是历史碎片的集合，就像今天人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岛的土地上慢慢挖掘出来的那些碎片一样。它不是把这些历史碎片扔在我们

面前，让我们把它们拼凑起来，并从中构建出某种历史。它以一个连贯的系列，叙述了过去历史中展示上帝创造、引导和控制整个历史的行动和干预的部分。它从上帝创造天地的起点开始，一直到约瑟之死，或者，粗略地说，到我们主的时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不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那样遥远。根据同样的粗略计算，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现在距离主的日子与亚伯拉罕在主的日子之前的距离差不多。这本书巧妙地回顾了这一漫长的时期，略过了世界和人类历史中对其目标并不重要的大多数细节，而全面论述了与上帝的行动和目的有关的重大事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旨意和一个目的指引着我们。我们看到，上帝从始至终都在做的工作在我们面前以一个巨幅画面的形式展开。

让我简要地提醒你一下我们面前所展现的主要事实。在第一章中，我们开始讲述上帝的创造，以及他对我们所生活的宇宙的逐步发展；我们被告知，宇宙中的万物都是上帝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而创造的，都接受了明确的委托，都被指定要达到一个美好的目的。万物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置于人类的统治之下，被人类征服并用于美好的目的。人的职责是增加和繁衍，补充大地，征服大地，拥有统治权。这是人的职责，但为了履行这一职责，他被警告要警惕一种危险——他被禁止享受某些快乐，他被告知这些快乐会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他无视警告，违抗向他发出警告的声音，结果，正如他被告知的那样，对他来说，征服大地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他将面临死亡。最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他本应享有的与神

圣的主人和引导者的充分交流，结果他迅速陷入了最深重的道德罪行，陷入了欲望和谋杀，这使他的生命无法忍受。因此，上帝采取了干预措施，将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地步的种族从地球上扫除出去，并给逃脱了普遍堕落的一个分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即使是在这一族群中，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挑选，并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将这一经过挑选的种族与上帝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上帝，他们肯定会再次堕落和腐朽。在挪亚的后裔中，他拉和亚伯拉罕家族被选中接受特殊的启示，并将不时向他们传达的上帝旨意代代相传。上帝被揭示为与这个家族订立了明确的盟约，要求他们绝对服从他的旨意和指引，但反过来也做出了某些明确的承诺，不仅是对族长本人，也是对他们整个家族，直到永远：

“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要在我面前行，成为完全人。我必与你立约，使你繁衍极多。... 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语。”

亚伯拉罕的这个家族因此成为特别指导和保护的对象，本书的其余部分叙述了族长后裔的教育情况。约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人物：他一心一意地生活在对上帝的爱和敬畏之中，在神秘的天意之下，他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管教铺平了道路。当本书结束时，他们在埃及定居下来，在那里停留了大约四百年，并开始了与人类所有文明的一系列长期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简单回顾一下，这就是本书的内容。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人类历史和人类知识的发展，一步步地证明了上帝的行动和历史进程的叙述是正确的，这些叙述在过去已经揭示，在未来已经预言。首先来看本书的开篇。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巨匠开尔文勋爵最近在本学院的一次演讲结束时宣称，科学已经确立了这一章所断言的主要原则。他说：“科学肯定了创造力。人不是在死物中生存、运动和存在，而是在创造和引导的力量中，科学迫使他们接受这种力量，并将其作为一种信仰行为。他们只在上帝的作品中认识上帝，但科学绝对迫使他们承认并完全相信一种指导性的力量，以及一种物理、动力和电力之外的影响。他们有一种精神上的影响，而在科学中，他们获得了关于这种影响在周围世界中的知识”。自《创世纪》第一章写成以来，不管那是怎样的时代，《创世纪》和现代科学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猜测迷宫？

创世纪与现代科学

在科学王子——会议主席称他为科学王子——能够毫不犹豫地宣布这是科学研究宇宙的结果之前，人类对自然界的起源、世界的发展模式及其目前状况的演变经历了怎样的迷宫？然而，在取得这一科学成果的数千年前，希伯来文作者就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通过一个有序的过程，为了一个美好的目的，逐步创造了宇宙的无限组成元素，最后造出了人，成为整个宇宙的主宰和统治者。

对于《创世记》第一章所记载的创世顺序与现代天文学和地质学的发现是否完全吻合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进行争论。奇妙的是，创世纪的记载至少是如此接近真理，以至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的可能性。就拿在其他古代记录中发现的所有其他宇宙论来说吧，特别是那些目前备受关注的巴比伦记录，其中又有哪一条记录可以让人一时认为它们与现代科学的记录之间有任何实质性的对应关系呢？然而，在不到十年前，一位杰出的科学工作者，英国协会主席，就曾指出：“即使是现在，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世界的发展，也不可能像《创世纪》第一章那样简明扼要、准确无误。”

请记住，当这一章写成时，科学还没有揭示出世界发展的任何过程。《创世记》第一章的知识没有任何自然来源。至少可以说，科学所慢慢揭示的事实，除了来自上帝的智慧之外，还能从哪里得到这种奇妙的近似呢，——除非，只有上帝的智慧才了解这些事实，也只有上帝的智慧才能让人类了解这些事实？

即使有任何理由相信本章的原始来源是巴比伦神话——最近被发现的巴比伦神话——也仍然无法自然地解释希伯来文作者是如何将这些神话——如德利弗教授自己所说——在“繁盛而怪诞的多神论”精神下构思出来的神话——加以提纯，并将其塑造成这些伟大的基本真理的表达方式，以及至少在总体上对伟大的发展规律的宣示。

但事实上，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本章的叙述来源于巴比伦。我们所能证明的只是两者之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如果认为希伯来语的叙述较早，而巴比伦语的叙述则是对希伯来叙述本身或其所体现的传统的歪曲，那么这种相似性也就很好解释了。因此，德国一位著名的评论家（莱比锡的基特尔教授）在一篇关于巴比伦发掘和早期《圣经》历史的小论文中刚刚指出：“希伯来文的叙述是较早的，而巴比伦文则是对叙述本身或其所体现的传统的篡改。”

巴比伦神话

威廉-道森爵士（Sir William Dawson）在 1894 年 2 月的《阐释者》（Expositor）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巴比伦发掘和早期《圣经》历史的小论文，该论文刚刚由基督教知识促进会翻译出版，他指出：“有一点是肯定的：《圣经》中关于宇宙的概念构成了我们信仰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它不是巴比伦的概念，而是极其古老的知识，一部分是经验的结果，一部分是上帝启示给人类并保存在他的子民中间的。《创世记》的这一章与其他地方盛行的关于创造世界的畸形神话和梦境的关系越多，就越能看出它是《圣经》作者的神迹和神的启示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圣经》叙述的后续部分，首先，请注意其中对人类在世界上功能的描述——增加、繁衍、补充大地，征服大

地并拥有统治权。正是在这些文字中，培根勋爵发现了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职责的最佳描述，并在这部给科学带来新动力的伟大著作——他的“*Novum Organum*”（《新方法论》）或“*Aphorismi de Interpretatione Naturae, et Regno Hominis*”——的标题中提到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英国人和其他种族比其他种族更充分、更认真地履行了这一职责，他们才在世界上占据了如此领先的地位。

从这一关于人类世俗命运的陈述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位神圣的作者是如何以敏锐的直觉立即转向实现这一命运所依赖的一点——我指的是人类的道德地位。他把人描述为置身于这样一个世界，园子里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既美观又适于食用，生命之树也在园子中间。人们被要求使用所有这些树，但有一个条件——造物主赋予他们的道德义务，即不去享受某些被寓意为“分别善恶树”的东西。今天也是如此。每个孩子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都置身于一个充满快乐和美好事物的乐园之中；但他们必须学会的第一件事是，他们在道德上有义务戒除其中的一些享乐；如果一个人沉溺于这些享乐，他的更高层次的生活，他真正的生活，就会被毁灭。他会发现自己的一切工作和劳动成果都会受到诅咒。简而言之，一个人必须学会的第一课就是：他的物质幸福完全取决于他是否承认自己的道德义务，以及他是否顺从上帝的良知之音。像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城市，可能拥有一切令人赏心悦目、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东西，但历史用最响亮的声音证明，除非在上帝的声音所昭示的道德约束下使用这些东西，否则它们都将

在我们的口中化为尘土——“虚荣的虚荣”。如果我们浪费时间去争论人类经历的这幅透彻的图画与巴比伦的一些记载有什么微小的相似之处，那岂不是太幼稚了，因为教训和寓意就在于，这位古代作家从朦胧而遥远的过去说起，从对人类在世界上的物质地位所做的唯一准确的描述中走出来，用一个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罪的来源与本质）；直到今天，人性的经历仍然是真实的。这个故事可能是寓言式的，也可能像柯勒律治所说的那样，既是历史又是寓言——人的全部地位，人的生命，不是取决于他周围美好和令人愉快的事物，而是取决于他在道德上是否服从造物主的意志和法则。在我们的种族和历史的萌芽时期，我们如何解释这样一个奇妙的启示呢——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

至于《创世纪》中紧接着涉及人类最早历史的几章，我只想说，它们为犹太教和基督教会记录了希腊、罗马或任何其他文学史料都没有为我们保存的东西，但目前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岸进行的发掘却为我们这一代人揭示了部分东西，即文明的起源

可以在美索不达米亚河谷以及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古城中找到。每一个基督徒的孩子，只要读过《圣经》的早期章节，就会对人类种族的早期历史有更多的了解，而直到最近，我们还无法从任何其他古代或现代的作家那里找到这方面的信息。关于洪水的故事，我也不再赘述，我只想指出，在巴比伦的资料中，有类似的叙述，这有力地证实了洪水确实发生过。与巴比伦和亚述传说中的传统形式相比，《圣经》中的叙述简单而自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圣经》是从这些传说中得来的；我们可以有信心地相信，《圣经》将被证明是对有关这一主题的最古老传统的真实记录。

但是，为了进行简短的演讲，我们必须从本书中这些有趣的部分（尽管在某些方面看似是晦涩难懂的）转到父系叙事；本书的大致内容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关于这一点，还有什么能比它们与广义的历史事实相符更特别的呢？历史的整个进程都是由犹太民族的影响和行动所决定的，最终以大卫之子（耶稣基督）的生与死而为目标，这难道不是历史最显著的事实吗？所有历史的关键不就在圣马太福音的开篇吗？“亚伯拉罕之子，大卫之子耶稣基督的世代记”？我们救世主的生命、死亡和复活，以及他所建立的教会，难道不是历史的核心影响因素吗？此时此刻，历史的进程难道不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取决于基督教的行动和影响吗？作为基督徒，我们难道不能认识到，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正是这一古老记录中所保留的应许的实现：“神的盟约，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谁告诉这位古代作家这一深刻的历

史事实的呢？是谁事先向他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位孤独的族长是一种影响的开端，这种影响将渗透世界，改变世界的法律，塑造世界的文明；亚伯拉罕将在多年后成为宗教信仰的典范；他的后裔大卫和以色列其他甜美歌手的诗篇将塑造人类主要的宗教生活和思想；他最伟大的后裔将以世界救世主的名字为人所知？

在这些族长叙事中，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它们不仅记录了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伟大历史影响的起源，还记录了宗教中最伟大的事实的一劳永逸的建立——即上帝与人类之间盟约的建立。当人们谈论犹太宗教的一神论特征时，当他们把这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时，他们往往忽略了另外的最重要的一点。这一点不仅仅是上帝只有一个，而是上帝已经明确地与人建立了道德关系；上帝先是以挪亚的名义，然后以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名义，在自己与人之间建立了最神圣的关系——盟约关系。文明的主要特征正是盟约及其所包含的相互信任。正是因此，婚姻、家庭、军队和国家都是通过盟约产生的；上帝自己作为一种活生生的个人力量进入了人类生活，他首先选择了一个人，然后选择了一个民族，最后选择了一个会众，与他结成盟约，订立相互的保证，并通过明确的标志加以确认——割礼和逾越节，洗礼和主的晚餐；因此，每一个犹太人的肉体上都有他与上帝个人关系的印记，每一个基督徒的额头上都有他与上帝个人关系的印记，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圣餐中的）饼和酒的象征中接受永久的见证，这不仅仅是他对一位上帝的信仰，不仅仅是他对救世主的虔诚，而是上帝对他的

个人关系，是他与上帝和救世主的直接盟约，就像他与妻子（教会）或地上的君主的盟约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种联系具有无限的生命力、穿透力和永久性，或者说，它是永恒的。《创世记》中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揭示了这一盟约体系，它是上帝与人类交往的基础，也是上帝约束和引导人类的核心力量。正如圣保罗明确断言的那样，福音的根基是在亚伯拉罕的历史中奠定的；而《圣经》的其余部分，包括《旧约》和《新约》，不过是一部关于这种方法的应用、保持和不断发展的历史。上帝的品格和方式在这些族长的历史中开始显现。它们是整个启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是整个启示的起点和萌芽。

内部证据

如果我们要理解上帝的旨意和内部证据，就不能不考虑这些叙述，就像我们要理解一棵树的生长，就不能不考虑它的根一样。

但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些叙述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历史。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它们叙述的是真实的事实？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必须指出，有些叙述——这些叙述就是其中之一——从其内在特征来看，它们本身就是真实的。难以理解的是，怎么会有人真的认为，叙事如此本能地反映生活和人性，在无数细节中留下了最生动感人的经历的痕迹，例如，那句感人至深的感叹：“在那里，他们埋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在那里，

他们埋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在那里，我埋葬了利亚”——有人会说，这样的叙述是后世人为理想化的产物。但更合理的问题是，它们怎么会保存在那个古老的年代呢？不到 30 年前，人们还很难对这个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读一读当时最有学识的评论家——比如像埃瓦尔德这样的著名作家——你会发现他把摩西时代的文字多少当作一个疑点。但是，就在最近几天，你们在每日新闻中看到了一个奇妙的发现，它终于消除了在这一点上的所有困难。你们知道，我们发现了一段很长的碑文，其中记载了一位与亚伯拉罕同时代的国王制定的法典，他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十四章中读到的暗拉非。那么很显然，早在亚伯拉罕时代之前，书写就已经非常普遍了，因为除非书写已经被人们所熟悉并习以为常，否则无法想象这样一部法典会以这样一种永久性的形式被铭刻下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创世纪》第十四章中，正确地记录了与亚伯拉罕同时代的国王的名字——这些名字被保存在纪念碑上，成为亚伯拉罕时代可能保存真实记录的见证。既然如此，重要事件——尤其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启示以及与他立约等重大事件——在当时被记录下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其有可能的。当我们进一步发现，当时的记录是如此仔细和详尽，以至于经过四千年的时间，它们以完全可读的形式流传到我们手中时，我们就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创世纪》中所包含的历史和族长记录是有办法保存下来的。《创世纪》的作者只需在神的指引和启示下，像圣路加在福音书开头描述自己所做的那样，将现有的记录和叙述，在“圣灵的启示”下，以“创世纪”为名，将它们书写成连

续的历史。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当一些评论家告诉我们这本书是由各种文献组成的，当他们提议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来剖析这些文献并分别描述它们时，这完全是次要的。解剖学家也是这样，当他看到人的眼睛时，就会把它解剖成肌肉、神经和血管，并把它的无数部分分别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正如柯勒律治所言，当你看到所有这些部分的细节时，那是人的眼睛吗？这种解剖是否向你解释了奇妙的生命过程的奥秘，通过这个过程，所有这些没有生命的元素结合成了我们的救世主描述为身体之光的奇妙有机体？对这本奇书的所有解剖和分析也是如此。根据我们一直在思考的真理来看这本书，它难道不会像一双灵感之眼、一双神圣之眼一样，让你着迷，让你洞悉大自然的创造、人类的道德构成、历史的主要力量的秘密吗？难道这些启示不在你的前后左右，不在你身上施展神秘之手，不在你面前揭示你自己、自然、历史和宗教吗？难道你们似乎没有听到神对始祖的要求：“当我奠定大地的根基时，你在哪里？如果你明白就说出来”？奠定这些根基的手和灵一定也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他们（始祖）的历史；也许圣经中没有任何一本书能更清楚地表明，先知的叙述在古代并非出于人的意志，而是上帝的圣徒受圣灵感动而说的。

女士们、先生们，上周五我有幸来到这里，今天我也来到这里，本以为我的发言会像本学院尊敬的院长雷伊勋爵那样正式。但我

发现，我应该就演讲的主题说几句。

现在，如果我要就这个问题发言，请记住，我只会说几句敷衍的话。坎特伯雷院长的演讲充分证明，在这场争论中，如果我可以这样描述的话，我们不是在捍卫以《圣经》为基础的传统信仰，而是在捍卫《圣经》本身。雷伊勋爵这样描述开尔文勋爵：“科学积极地肯定了创造力”。这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一场巨大争论的最后结论。我们不能指望对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场争论说出最后一句话，但我们可以期待在这场争论上取得一些进展。我重申，这不是一个捍卫有关《创世记》的传统信仰的问题，而是捍卫《创世记》本身，抵御那些已经有的攻击。在我早期的生活中，我被教导要相信摩西写了《创世纪》，就像莎士比亚写了他的戏剧一样。评论家们发现《创世纪》中有文献记载，认为这就提出了《创世纪》是否具有神权的问题。但是，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牛津大学的费尔贝恩教授也非常明确地指出——相信有位格的上帝就意味着相信有成文的启示，那么，在亚伯拉罕时代之前的数千年里，上帝竟然没有给他的子民启示，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如果说评论使我们发现《创世纪》是神所认可的早期启示的记录，那么在我看来，这非但没有损害它的权威性，反而证实了它的权威性。

我能顺便谈谈宇宙论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记得格莱斯顿先生和赫胥黎教授在《十九世纪》中就这一问题进行的伟大交锋。赫

胥黎教授似乎清楚地表明，科学研究的明确结果与《创世纪》第一章之间存在冲突，但事后证明这只是一个错误。在《十九世纪》的版面上，他表达了对丹纳教授的钦佩，并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坐在他的脚下，而丹纳教授在写给《十九世纪》的信中说，他同意格莱斯顿先生的观点，而不同意赫胥黎教授的观点。

现在，关于《创世纪》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讨论希伯来语，然后再讨论建筑学。在这两方面，我和剧场里的其他人一样，都是学习者和局外人。我们转向希伯来语者，他们都认为《创世纪》没有提供可以证明它是一部晚期著作的材料。关于拱廊学的下一个问题，今天在座的有谁能告诉我们，考古学中有哪一个发现是反对《创世纪》的？坎特伯雷院长提到了《创世纪》第十四章中提到的暗拉非。不久前，在研究这一章时，我翻阅了史密斯的《圣经词典》，以便找到我可能了解到的关于暗拉非的信息。文章的作者是品奇斯博士，大意是我们对暗拉非完全一无所知，但希望未来的研究会有所发现。品奇斯博士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些主题的书，书中的插图就是暗拉非的肖像！

下面我想谈谈要求我们否定《创世纪》的证据问题。如果我冒昧地说，我有一定的能力来处理这类问题，我想我不会被指控为自以为是，因为在处理复杂的证据问题或试图发现欺诈行为方面，我并不是一个新手；而当我考虑要求我们否定摩西五经真实性的理由时，我的内心充满了茫然和惊讶。坎特伯雷的院长提到了暗

拉非的法典；他告诉你们，就在昨天，摩西五经还被搁置一旁，因为人们认为在摩西时代就有这样的文献是不合时宜的。现在，评论家们发现亚伯拉罕时代就有这样的文学作品。但他们如何利用它呢？在这部巴比伦法典中，有与摩西法典相似的律法——尤其是关于不忠妻子和屠杀牛的律法。但是，当我们发现巴比伦法典和摩西法典中有每一个文明国家法典中都有的法律时，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任何一个对证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看一看惩罚是否相同；但在任何一个案例中都没有显示出这一点。

在我坐下之前，我还想说一句话。我不能同意放弃我作为基督徒的地位；因为基督徒持有《旧约全书》并不是由评论家允许的；他是从他神圣的主人和救主手中得到的。

路加福音24：44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

=====

=====

=====

=====

戴斯-达克沃斯爵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我的职责是以你们的名义，当然也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表达我们对今晚讲话的重大价值的认识。这篇讲话出自一位如此伟大的权威之手，涉及如此重大和重要的主题，而且其本身的性质又是如此微妙和困难，我想，没有人会在听完这篇讲话之后，立即起身辩论它或对它进行长时间的审议。这个问题要求我们把它印刷出来，仔细阅读，认真思考，因为我认为它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毫无疑问，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吸引全欧洲最有学识的神学家和学生的注意（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庆幸）。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们收到了一位大师就这一问题所撰写的文稿，它值得最仔细的阅读，而且我大胆地认为，在座的几乎没有人真正适合对它进行详细的评论。关于这些会议，我认为，今天在我面前有这么多人出席会议，肯定会让组织这些会议的人感到高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所引起的广泛关注，也许超出了举办时的预料。我们可以十分肯定，这样做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我想，我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一个我们认为这个国家，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科学大师之一的人受到其他人的攻击，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们本可以期望，在这些问题上出现的争论会以平和的心态进行，当然也会更有礼貌。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满足于在当时向你们致辞的如此伟大的人物的阴影下安息，我想立刻非常谦恭地说，在

当时出现的争论中，我将站在他这一边。在这个时代，人们的信仰非常不稳定，事实上，我几乎可以说人们的信仰非常缺失，因此，像这样的协会才会提出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年轻人对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得出结论之前。在这样一个机构中，提出这类问题尤为重要。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被特别选中担任这个职务。我认为这表明，我作为医学这一伟大职业的代表，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信仰很感兴趣。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我想我也可以说，在英国，我所代表的医学界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他们自己的。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情况并非如此。我记得几年前在伦敦东区做过一次演讲。演讲结束时，一位德国医生走过来和我交谈，他说，听到一位英国医生在基督教信仰问题上教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感到非常震惊。他说，“在我的国家，我们没有信仰，我们是医生”。这句话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们知道，在欧洲大陆，基督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科学工作者的信仰相分离的。一般来说，在科学工作者中，有许多人可以被视为自由思想者或不可知论者，他们自称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持有基督徒所持有的简单信仰，而且他们显然也不太关心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而我們有许多不太杰出的科学工作者把这些伟人的思想状态当作一种崇拜，他们认为效仿其中一些遇到困难的人是很有必要的。至于那些对基督教信仰不确定的人，其结果有时是一种我可以称之为

色盲的影响。这些人是诚实的，但他们看不见。他们希望得到绝对的证明和明确的肯定，否则，他们的思维习惯就会阻碍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信条，或坚持我们所说的信仰。此外，我还要补充一点，信仰不是一个实验证明或实验演示的问题。在基督徒的信仰问题上，我认为人们常常忘记，信仰既是心灵的问题，也是思想的问题。而在这一切的基础上，你必须有完全的谦卑和对人类洞察力极限的认识。毫无疑问，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限度正在缩小。人类洞察力的局限性已经不是两千年前的局限性了。科学正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揭示和让我们了解许多事物。但我个人认为，科学与启示宗教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和对立。作为一个以所有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伟大专业（医学），我们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我们准备接受任何真理的启示，没有什么会让我们感到惊讶，没有什么对我们来说太奇妙；但这些都不会动摇我们对神圣事物的信仰。另一方面，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会因此而建立，而不是削弱和摧毁。我坚信，只有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才能最好地实践我们的艺术和才能。任何从事我这一职业的人，如果没有基督教信仰、就去病床边或垂死的人身边，我都会为他感到遗憾。经过多年的经验，我可以这样说，我所见过的最好、最幸福的病床都是基督徒的——我在所有国家、所有条件下都见过许多基督徒死去。

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更加谦卑的态度。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应该记住，坚持信仰并不是要求绝对的证明。我们知道，信

仰是对看不见的事物的证明，信仰的恩赐会降临到那些愿意尝试和相信、并虔诚地寻求帮助的人身上，使他们的心得以敞开，能够看见和相信。归根结底，基督教是一种实际证明的东西。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我在这个行业中最伟大的朋友之一安德鲁-克拉克爵士在这样一个集会上发言，在长篇大论之后，他说：“让我建议你们尝试一下基督教。毫无疑问，这其中蕴含着一个最大的秘密，那就是在信仰中建立我们自己。信神儿子的，就在他自己身上作见证”。让一个人尝试并实践基督教的崇拜，当他这样做并日复一日地实践时，信念就会降临到他的身上，而降临的方式绝对不外乎尝试一效法天主的生活。我相信，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以正确的态度找到并坚持信仰。这就是一种恭敬、谦卑的态度，相信有许多事情是不为我们所知的，但其中许多事情将由我们之后的人揭示出来，而在一切之上和一切之后，是伟大的万有之主，是一切事务的主宰，拥有一切力量，是一切心灵的主宰，是我们伟大而神圣的父亲。

我非常高兴地向 Margoliouth 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我无法形容，对我来说，而且我确信，对讲台上的其他白发苍苍、心智老迈的人来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集会是多么大的荣幸，在这样一个集会上，青年男女不是被迫聚集在一起，而是自愿来聆听大学额外的讲座，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头脑中为我们的信仰找到一些更重要的理由；这些理由不仅可以让我们在信仰中站稳脚

跟，而且更重要的是一—这就是这些讲座的价值所在—我们可以把这些理由传递给其他人；因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常接触到其他人的思想，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听到一些来自粗心大意的头脑和嘴唇对宗教的嘲笑。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们都可以认识到，为了我们共同的基督教事业，我们应当在精神和心灵上尽我们所能，做世界上一切有益的事情。

马戈里乌斯教授以一种非常精湛而又非常简单的方式论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这种方式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思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思路完成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他在演讲中有两句话令我印象深刻。首先，他说宗教的功能就是把口头传统变成书面传统，把口头语言变成书面语言。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有很多语言，很好很强的语言，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语言，在传教士到讲这些语言的人中间之前，我们对这些语言一无所知，听都没听说过；当传教士去了之后，发现需要把圣经翻译成这些语言，我们才知道这些语言是什么。教授还说了另一句话—新宗教往往会淘汰旧宗教。有些人告诉我们，基督教完全是一种新的宗教，《新约》和《旧约》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马戈里乌斯教授提到的那个规律，《新约》就会淘汰《旧约》。但事实证明，《新约》只是对《旧约》的补充，因此《新约》并没有淘汰《旧约》；它们被证明是同一启示的两个部分。

人类经验的见证

作者：R. R. E. 威尔士牧师，硕士

基督教通过三种方式来到我们身边。(1) 通过文字记录，即新宗教所创造的原始文学的遗存。这些文献及其价值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2) 它是我们所处环境中的一个因素。基督教，我们发现它就在我们周围，当我们来到这里时，它也发现了我们——一种制度、一种传统、一种影响、一种与社会和民族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因素。(3) 它作为一种个人经历来到个人身边，一个人永远无法将其中的秘密完全传达给他的同伴。在它成为文学或历史之前，在它展现在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之前，在它写成著作之前，它是一种个人经历。一个人得到的关于其真理的最初和最后的证明，可能都是个人的亲身经历——尽管可能会有许多其他证据来证实这一点。

基督教是我们所生活的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无论是在无数的个人经历中，还是在社会和企业生活中，它的运作都产生了大量需要分析和评估的材料。

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来检验它呢？

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教授——最新、最年轻的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在他最近出版的以科学方法论述的著名著作《宗教经验的多样性》中，提出了两个标准供我们检验：（1）“直接的光辉”；（2）“道德上的帮助”。

第一条标准，“即刻发光”，几乎不属于我的主题范围；但我要谈谈它，为思考指明方向。

它本身就是一种体验，非常亲切，难以再现，但却能帮助我们跨越时代和距离的障碍，而这些障碍似乎使我们在评价围绕着“基督”这个名字的一切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现在打开《福音书》这四幅画，让画像映入我们的眼帘。从这些肖像画中我们看到的面孔都有一种立即发光、立即令人信服的感觉，它融合了奇异的色彩和非凡的元素，但又自成一体，和谐独特。让“面孔”留下它自己直接而纯粹的印记，看看我们的直觉是如何迅速接收到活生生的现实印象的；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的童心回家。我们永远无法将“面孔”从我们眼前移开；无论文学或科学问题会看似如何阻碍我们的信仰，我们都不会失去他对我们深层本性中难以言表的、细腻的东西的独特吸引力。无论他看起来多么奇特，故事多么不可思议，他都会给你的精神留下真实和

神秘力量的印象。

在许多时代和条件下，人的这种直觉都能迅速判断真伪，而且从长远来看不会被欺骗。你可以放心地接受“视觉神经的权威”，回应基督的“直接光辉”。

从本质上讲，我们必须考虑到内在意识的见证，考虑到人心中的持久现象。关于勒南的理论，有人问他：“你是如何对待罪恶的？”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抑制它”。但它始终存在。我们在衡量基督教时，不能不考虑到侵扰人类生活的罪恶，不能不考虑到那些坚持要使自己成为经验中最大因素的需求和顽固的本能。基督的存在——这是他的故事的主题——只是为了解决这些痛苦的紊乱，满足“灵性辨别器官”的这些直觉；离开这些不可抗拒的心灵需求来估量他里面的真理是徒劳的。当心灵和良知觉醒时，它们对判决就会有话要说，就像理智和科学本身一样科学有效。

在开始讨论我们这个主题的核心问题之前，请允许我顺便提及一个值得大学学院的学生们感兴趣的案例——第一个为女学生争取到入学机会的女学生的案例。她就是爱伦-沃森（Ellen Watson）——我只能概述一下她的故事——她赢得了罗斯柴尔德展览会和应用数学与力学的主要奖项。她对该学院的克利福德（W. K. Clifford）教授深为敬仰，并深受其影响，热情地称他为“大师”。他曾是一名“高等教会”（即金字塔式权力架构的教会体系）教徒，却把

基督教抛到了九霄云外；在他眼里，基督教在科学的检验下烟消云散。他以疯狂的、可悲的坦率承认并痛惜这一损失：—

“我们看到春天的阳光从空旷的天堂照出，照亮了没有灵魂的大地；我们无比孤独地感受到伟大的伴侣已经死去。我们都将在地球最后的毁灭中被卷走。这种想法令人悲哀，否认也无济于事。但是，我们必须像神父奥丁一样，快马加鞭，与末日之狼决一死战”。

奇怪、寒冷、讽刺的“欢快”！

爱伦-沃森也是从类似的立场出发的。她当时常说：“我不需要宗教，科学完全能满足我。我的地位远远低于许多谦卑的基督徒。但我拒绝基督教并不是因为它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或在道德上有缺陷，或出于任何此类原因。只是我觉得它不是我所需要的”。她坦率地承认，“对于基督教的全部证据，她完全一无所知”。启蒙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

她的英雄教授和她自己一样，也出现了“肺癆”的症状。“肺癆”在杀死人之前会亲吻人的身体。当她看到他逐渐消逝的时候，她的心被震撼了。“今天早上，我向他道别，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我很难不感到绝望；我不禁要问，既然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不久，他去世了。这一打击唤醒了他的学生沉睡的心。“这就是全

部吗？”这个问题主导着她的思考。她只是没有灵魂的宇宙中的一个原子，只是普遍规律的牺牲品吗？她无法相信，然而，“我希望你的生命是我的”，她写信给一位基督徒朋友。这种内心的渴求变得更加强烈，《追忆似水年华》的学习刺激了她，而另一位她对其研究感兴趣的学者的突然离世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渴求。这些爱与希望的破碎激起了她超越科学界限的渴望，“就像一个愤怒的人，心站了起来，回答说：‘我已经感觉到了’”。

我在那里参观了她任教的学校，看到了她早逝时安息的地方。但她已经写道：“我相信上帝，因为我感受到了神的存在。如果爱和崇拜就是信仰，那么我信仰基督。然而，我为此挣扎了很久”。在重复“上帝的羔羊，天父的儿子，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句话时，她的声音和生命都停止了。直到最后，她仍然保持着对科学的崇敬。但她说，她身上发生了一种变化，“就像从梦中醒来，来到了现实中，并感觉到我们一直是做梦的人”。

我举这个例子——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内在生命本能的觉醒可能会带来不可否认的证据和信念。基督教信仰有着大量充足的外部证据；然而，人内在的精神也必须有自己的“发言权”。

“我真希望我能相信你们那个美丽的宗教，”一位曾在这所大学里担任过杰出科学教师的人对我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个“愿望”

说明，即使在科学枯竭的时候，直觉也能为基督作见证，而且这种见证具有科学价值。

现在来看看第二个标准。

信仰、基督教的道德产物，在个人经历和群体历史中产生的影响，必须是本案的各种见证之一。詹姆士教授有一种简明扼要的说法。他说：“真正的，”是“在整体上”——即在广泛的经验领域——行之有效的东西。

那么，基督教是如何“运作”的？基督教并不一定与教会和职业教会主义相联系，而是，在其统治精神和原始纯洁性方面是如何“运作”的？它的特色是什么？它的产物是什么？

顺便说一句，这种道德检验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督教精神的产物，它影响了我们的标准，并在我们衡量真理的标准中植入了道德因素。一个体系或一种信仰的道德结果并不是异教的标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基督教影响的产物，本身就是其质量的标志，是基督教所贡献的伦理因素的标志。

1. 在历史的尺度上运用这一标准。

道德帮助

由于这一领域是如此的广泛，我甚至不能在此开始划定它的界限，而应请你们重视独立的学者们在总结他们的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时所说的话。

已故的罗曼尼斯教授曾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但在临终前又开始信奉基督教：

“基督教对人类生活的革命是不可估量的，是历史上任何其他运动都无法比拟的，这一点从各方面都值得考虑（公然的无知或低级的庸俗除外）”。

让-保罗-里希特（Jean Paul Richter）以更诗意的方式认识到了至高无上者的世界影响力，他说：“至高无上者是强者中的至高者，是圣者中的至圣，他用自己被刺穿的手将帝国从铰链上掀起，使世纪之流偏离航道，至今仍在统治着时代”。

爱默生说到，“耶稣给人类留下了独特的印象，他的名字与其说是被写入了世界历史，不如说是被写入了世界。”

吉本和莱基先生（在他的巨著《欧洲道德史》中）——他们都不是站在教会的立场上写作——都充分展示了原始基督教进入并征服罗马帝国时新生命的爆发。我无需描述罗马社会的奢华、堕落和无

耻恶行——人的生命是廉价的；美德、贞洁、家庭团聚，对他们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妇女、奴隶和儿童任由主子们随心所欲地摆布！血腥的角斗表演满足了人们最卑劣的欲望——甚至连温文尔雅的人也在幸灾乐祸地享受着受伤的受害者在窒息中的感觉！而斯多葛派的“智慧和高尚的道德洞察力”，却无力熏陶社会，使其复兴。

基督教进入了这个堕落的异教，尽管遭受了残酷的歪曲和苦难，它还是传播开来，并逐渐为这个社会注入了新的道德生命。新的宗教使颓废的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它对妇女、家庭、奴隶、无用之人以及社会的浪费做了什么，让莱基先生来讲述，让“Quo Vadis”用一个故事来说明。马克斯-穆勒说过：“人道这个词，你在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那里寻找也是徒劳的；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上帝的儿女，这是基督教促成的理念”。是的，如今怀疑论者常常试图用人道主义来取代宗教，但人道主义本身就是基督教注入他们和我们所有人的一种精神。正如本杰明-基德博士（Dr. Benjamin Kidd）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社会之盐和撒玛利亚好人的大量利他主义情感和人类服务，正是基督教化心灵的产物。罗马人看到我们的现代战争引擎会大吃一惊，而看到战斗部队后方的红十字大队救助伤员也会大吃一惊。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融入了欧洲各国的法典和企业生活的根基，为其贡献了更多的精髓。它是理想的创始者，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精神的创造者，这种精神虽然不可捉摸，在某些时期也会受到抑制和压制，但它能在一切

衰败中幸存下来，并再次崛起，成为公众的精神支柱。但并不总是在教会里——官方的基督教组织往往是鱼龙混杂的，基督教思想有时在教会之外比在教会之内更容易找到。在近代，推动废除奴隶制运动的可能不是官方教会组织。但领导这场运动的人深深地汲取了基督教的泉水。你不能把基督教精神封闭在一个组织的围墙之内。随便你怎么评价官方组织的宗教体系——它的优缺点是另一个问题，对基督教来说并不重要；但有一点仍然是真实的，那就是创始人的精神总是能从腐朽的坟墓中重新站起来，成为一种健康、肥沃和提升的力量，就像空气中的氧和光照中的辐射线一样。所谓的基督教文明中存在着令人震惊的弊端——这些弊端在基调和特征上没有半点基督教色彩；但针对这些弊端，总有一种深刻而广泛的抗议，这种抗议是古罗马所不曾有过的，也是当今异教国度所不曾有过的；有一种强大的基督教思想在禁止和阻挡这些险恶的弊端，它预示着战胜这些弊端的胜利即将到来。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道德提升的原因还是结果？在文明复兴之前的罗马衰落时期，它首先出现在时间的长河中，而在今天，它作为一个新的再生社会的春天，在我们的眼前，在野蛮的土地上运行着。即使它只是在最高级的种族中崛起和生存，并与最先进的文明并驾齐驱，这本身也会给它打上烙印，赋予它“时代的证明”。但它不仅仅是机械的结合，而是与社会和公共生活中最优秀的因素的化学结合。除了基督教产生的因素之外，社会中还有许多好的因素——上帝以多种方式存在于他的世界中。然而，当基督教消

失或失去控制时，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社会的解体，这一点一如既往。不信教的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虽然他们自己否认或怀疑，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希望维护“迷信”，将其作为一种有用的警察力量。

我将在下一轮探究中提出这个问题，我只是在此暗示这是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如此人道和有益的结果会是一个幸运的妄想的结果吗？难道虚构的东西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拯救社会？历史上的谬误会不会成为社会复兴的工厂，并永远激励着社会生活中的佼佼者？如果失去了这一幸运的“虚构”，如果“真相”——怀疑论者所了解的“真相”——为人们所知，那会是一场公共灾难吗？如果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解体的灾难，那就表明不幸的“真相”终究是一个有害的错误。只有从根本上说是真实的东西，才能在历史的大范围内永久地为人类的最高利益服务。

2. 将“如何运作”这一标准应用于个人经历。

毋庸置疑，在无数人的经历中，这些最理智、最优秀的人，他们所拥有的最大的道德动力是以基督教及其创始人的名义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我们可以对这些重要的事实进行解释，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的生活 and 性格已经完全变好了，他们固有的自然习惯被压倒了，他们的倾向被扭转了，一股新的潮流开始了，并使旧的潮流倒退。事实证明，这种动力比鸦片习惯、酗酒习惯、情欲习惯

更强大，比自爱的力量更强大。它抓住了奥古斯丁，征服了他的恶习，将他重新塑造成一个全新的人。它将狂野的无赖水手约翰-牛顿变成了虔诚的基督教赞美诗作家。在加德纳上校、雷蒙德-卢利以及其他许多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性格和生活的变化——有时是一场戏剧性的革命，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再生精神的悄然崛起，以及一种植根于基督教土壤并得到滋养的精神的发展。

马克-卢瑟福”（黑尔-怀特先生）本人是基督教信条的践行者，他说，“我可以向我那些难以置信的文人朋友们保证，多年以前，男人和女人突然醒悟到他们曾经是罪人，并申明从今以后他们将在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帮助下遵守上帝的诫命，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更难得的是，他们在余生中确实遵守了上帝的诫命”。

罗曼尼斯教授基于科学原则，不得不考虑这些经验现象，他说，“无数、各国的文明男女都重复并见证了这些经验.....。在所有情况下，这不仅仅是信仰或观点的改变；这绝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一种或多或少深刻的性格改变。...对于纯粹的不可知论者来说，这些改变生活的证据，就在于基督死后不久出现的大量心理现象，这些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在全世界都普遍相似”。

如果我们在加利利目睹了大自然的奇迹，所有的疑虑都会烟消云散吗？我对此表示怀疑。这些改变了的生命和重生了的性格，看

起来都像是道德奇迹；让我问一下，哪一个更容易，哪一个更能体现神的力量——让一个瘸子站起来行走，还是把一个坏人和他固有的习惯转变成纯洁善良的性格？

道德奇迹更符合基督自己的教导和目标，也确实是比物质奇迹更高的考验。

最早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的攻击者之一塞尔苏在书中蔑视基督徒邀请和热情接待“坏人”之类的人，认为伦理哲学家在吸引有声望和更优秀的思想方面表现出了他们的优越性。但是，“坏人”只是智者的试验品，是世界上所有问题中的最后一个：谁或什么能吸引他并重新塑造他的性格？塞尔苏说，“那些天生就有恶习并习以为常的人，是无法通过惩罚来改变的，更无法通过仁慈来改变；因为要改变天性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是的，的确如此；但奥利的回答很好：

“当我们看到塞尔苏所说的愚昧的教义像有魔力一样运作时，当我们看到它如何使许多人一下子从无法无天的过激生活变得有条不紊，从不义到善，从胆怯到原则的力量，以至于为了宗教，他们甚至蔑视死亡时，我们难道没有充分的理由钦佩这种教义的力量吗？”

事实上，按照里茨尔及其当今颇具影响力的学派的说法，基督已被证明是一种意识的事实。无论在哪里，只要这种意识的体验是迅速而创造性的，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它就会显示出自身的动力，不断使美好的品格再生或成熟，或成为恩典的艺术家。

但是，J. S. 米尔和其他人都认为，这种个人经验只对个人本身有效，对旁观者没有任何证明作用。然而，尽管它只对当事人本人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对于那些有足够亲密接触的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次要的体验，可以接收到改变了的生命和基督教崇拜的微妙印象和闪光。基督意识以公开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可验证的产物可以被客观地研究。

诚然，这些内在的印象和体验是可以随意解释的。每个人都宣称他在灵魂深处感受到或知道什么。这种证据往往是“无知者的庇护所”，是狂热者、蒙昧主义者和深奥爱好者的避难所，他们被自己不正常的印象投射出来的阴影所伤害。许多个人意识所证实的许多事情都必须被视为不科学而被剔除。

但是，从这些基督教动力的广泛经验中，看看在不同的条件下，在不同的时代和种族中，在历史和经验中，有哪些是大量出现的，有哪些是恒久不变的善的力量，有哪些是被人证明是理智和可靠的，有哪些是在可见的生活中“行之有效”的：这些经验不能被视为个人的任性。在这里，我们有反复出现的经验，这些经验显

示出在各种条件下的持久性，以及积极产物中明显的道德稳固性。在这些持久的经验中，大自然并没有欺骗我们。这些与基督有关的、在生活和性格中显现出来的显著的、多样的、反复出现的经验，难道不是支持基督教作为重要真理的有效而有力的推断吗？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家，莱基先生有理由说，它（基督教）是“有史以来作用于人心的最有力的道德杠杆”。

然而，我们决不能忘记，所有这些宗教体验和个人生活中的革命都被某些人解释为仅仅是生理变化的幻觉。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的“幻觉”被今天的某些自由派（不信派）知识分子称为“枕叶皮层的放电病变，他是一个癫痫患者”。正如詹姆斯教授所说，“医学唯物主义将圣特蕾莎视为癩病患者而扼杀，将圣方济各视为遗传性退化症患者而扼杀；将乔治-福克斯对时代骗局的不满和对精神真实性的渴望视为结肠紊乱的症状。卡莱尔的痛苦呻吟则被解释为胃十二指肠溃疡。它说，所有这些精神过度紧张的现象，（医学唯物主义认为），究其根本，不过是由于各种腺体的变态反应（很可能是自身中毒）造成的，生理学将会发现这一点。医学唯物主义认为，所有这些人的精神权威都被成功地破坏了”。

但是，如果我们必须将这一原则应用于这些情况，我们就必须全面应用这一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詹姆斯教授精明地回答的那样，肝脏必须被认为“决定了坚定的无神论者的论点，就像决定了对自己的灵魂忧心忡忡的卫理公会教徒的论点一样果断。当

肝脏以某种方式改变渗透其中的血液时，我们就会得到卫理公会教徒，而当肝脏以另一种方式改变血液时，我们就会得到无神论者的思想形式”。根据这一理论，即使是怀疑论者的不信，医学唯物主义者的科学理论，也与基督徒的经验一样，都是腺体和自身中毒的产物！于是，理性本身沦为病理学，而我们试图解释生命的这一智慧工具只是物质的运作，我们只能彼此对视，怀疑自己是否是喋喋不休的自动机，是否在胡言乱语；因此，我们最好回家去，不要再问问题了！这是对人类生活进行智慧解释的所有尝试的荒谬归纳。

这些道德奇迹和基督徒的经历并不是河面上的漂浮物，不是——“狂风巨浪中泡沫上的气泡，风和水的力量制造的漂浮事件”——克利福德教授称之为“表象”。它们过于恒定、典型相同（虽然模式各异）、理智且经过检验，不可能是畸变和幻觉。

同样真实的是，心理学分析，——如詹姆斯教授本人以如此新鲜和娴熟的形式提供给我们的剖析，——并没有消解这些道德奇迹的意义，正如他所指出的，也没有蒸发它们的权威性。如果说这些精神危机和生活的改变是潜意识自我的爆发，那么我们只是把问题抛回了一步。当我们追溯这些现象以及变化出现和结晶的模式时，我们并没有解释它们。说明“如何”并不能回答“为什么”和“从何而来”。我们有可能雕刻人的躯干，解剖人的大脑，直到人们失去对栖息于万物之中的活灵活现的现实的信念；我们同样

有可能刨根问底，直到人们失去对信仰、经验的核心是确凿无疑的真理的信心——事实上，失去对打动普通旁观者的生命力和美感的感觉。我们必须为了正确的辨别而筛选一切，但又要站在后面，获得活生生的整体的广泛印象。在最可靠的心理学家的帮助下，分析和追溯这一切的方法和过程；仍然存在着广泛、坚实、持久的经验，这些经验不能被单纯的分析所消解。当理论家们在提炼和剖析，直到在他们眼里整个事情都烟消云散的时候，基督教的动力却在或多或少地创造着同样的道德奇迹，事情正在“起作用”——*solvitur ambulando*。

现在，这些经历和道德奇迹是否意味着在基督里有一种超凡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异教，甚至智者中的哲学，无法在坏人身上创造道德奇迹。卡莱尔在《萨托尔-雷萨图斯》第二章中写道，“（基督教以前的）旧世界不知道什么是皈依；他们只有一些‘大力神的选择’，而不是*Ecce Homo*”。

伦理文化尽管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却缺乏产生这些道德革命和这种精神类型的人的动力。就像塞内加（Seneca）和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斯多葛哲学一样，它只适合所谓智者，对迷失的人没有吸引力。正如罗曼尼斯教授所见，在基督时期和之后，这种新的向善力量迸发出来，成为基督徒活

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基督触及、利用、工作的对象如此贴近人类，如此强烈，如此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如良知、对罪恶的恐惧、爱、生命、死亡、看不见的奥秘——这些都是人类生命的原始元素和主要成分，这是否可以解释基督的特殊力量呢？然而，这本身就表明，基督掌握了存在的终极事实，对人性的泉源有着独特的驾驭能力。此外，易卜生、左拉和托尔斯泰都曾使用过人性的原材料，处理过生命的基本内容，但他们只能揭露，而不能治愈。基督对人性的处理为何具有无与伦比的再生力量？这不仅仅是对人性中重要情感和敬畏的亲密处理；在他的光中，有放射线在诉说；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治疗和净化。

这是否是潜藏在人性中的某种东西，正等待着某种体现我们深层本能的幸福理想去“挖掘”？但基督教“挖掘”这些潜在本能、汲取潜意识生命的特殊力量从何而来？是什么赋予了基督与众不同的力量，使它产生了其他宗教无法产生的结果？或者，当我们以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为例，指出道德教育本身的无效性时，这是否仅仅意味着，人仍然如此不发达，以至于他们需要一些虚构的东西来生动地模仿道德真理，需要一些故事中的具体理想来将道德元素融入想象，并将其深深地植入人心？但是，即便如此，如果部分属实，这难道不是现实而非虚幻的证明吗？

“于是道有了气息”；在这个充满科学奇迹的宇宙中，如果我们的精神所在的宇宙在神的化身中也有自己的奇迹，这难道不奇怪吗？

但是，以基督的传统名义浮现在我们思想中的理想，难道不是一种好的启示吗？在这种情况下，“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并不重要”——已故的格林（T. H. Green）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在保罗之后的两代人中，人们对伦理导师基督作了精神上的解释，将他从历史的范畴中抽离出来，将他作为一个神圣的理想固定在我们的思想中。因此，人们可怜地试图以某种形式留住他，甚至紧紧抓住幽灵不放！

对此，有两种答案。

(1) 文字证据，虽然不在我们目前的研究范围之内，但至少可以简要地提出一条。我们有关于基督徒经历的真实记录，这些记录与基督诞生的时间非常接近，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间隔来发展这种传说中的“理想”。

与基督教有关的最早文献——基督同时代人的四封书信——几乎所有值得考虑的怀疑论权威都无可争议地认为是真实的。这些信件把我们带到了基督时代的边缘。它们写于基督死后二十五至三十年内。在此期间，作者保罗曾是圣城第一批基督徒的不信者和迫害

者，后来成为了一名热心的传教士，并在地中海一带传播福音。这些文件是他写给一群皈依者的信，这些皈依者在大约二十八年前通过同一机构赢得并改变了他们；这些信表明，在过去的岁月里，基督教已经在哥林多、加拉太和帖撒罗尼迦得到了传播和体验。这些文件被公认为是真实的，它们展示了基督作为超自然的、神奇的、神圣的救世主和稳固的基督教的最新观念。从所记述的事件到这些书信的写作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太短了，不可能产生美好的传说幻觉；像这些书信所揭示的那样，神话也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形成如此紧密的故事。

仅凭这一点，缓慢编织的理想作为善的动力的理论就不攻自破了。

(2) 我们的经验为这样一种理论提供了第二个答案，即一个以基督的名义浮现在我们生活中但没有完全历史真实性的美化理想是基督教的有效力量，即试一试，在生活中试一试，看看它是否能取得道德上的成就，就像我们在活生生的历史性的基督神圣下所知道的那样。理想在想象中看起来很美好，但却很难留住基督教的非实体灵魂。在实际的人类活动中，它是软弱无力的；虽然它可能会提升罕见的个人，但在人类斗争的艰难压力下，它往往会变得虚无缥缈，消失殆尽。理想要想在道德上具有力量和吸引力，就必须在其上显示出活生生的现实的伤痕；用路德的话说，它必须有手有脚——是的，它必须客观地存在着，彻夜存在着，手上有钉子的印记。

是的，在基督里充满活力的灵魂就在于它染红的现实性。一个披着虚幻外衣的理想能否站稳脚跟，实现莱基先生所说的基督教的成就？

“基督教留给世人的，是向世人展示一种理想的品格，这种品格历经十八个世纪的变迁，以慷慨激昂的爱充满了人们的心灵，并显示出自己能够影响所有时代、民族、气质和条件；它不仅是美德的最高典范，而且是实践美德的最大动力，并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可以这样说，关于基督教的短短三年的简单记录，就能真正体现出这种理想的品格”。

可以说，短短三年积极生活的简单记录，比所有哲学家的论述和道德家的劝诫更能使人类重生和软化。这的确是基督徒生活中最美好、最纯洁的源泉。在所有的罪恶和失败中，在所有玷污了教会的神甫术、迫害和狂热中，教会在其创始人的品格和榜样中保留了持久的重生原则。

由没有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加利利人编织的理想幻觉，竟能如此肯定而持久地击中目标，成为世界、历史和个人经验中最有效的善的能量，这可信吗？幸运的幻想：如果它能在一个充满梦想的时代中崛起，并创造出具有圣洁品格的新人，彻底改变社会！由一个人和关于他的幸运幻觉组成的综合体，永远不可能生存下来

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妄想永远不可能持久地为最高的人性、真理和美德的利益服务。

有些人认为，在“偶然的巧合”下，它是如此幸运的妄想，以至于像古罗马的怀疑论者一样，他们想要维护公众对它的信仰，将其视为道德警察，视为现存的最好的向善动力。奇怪的、不协调的证明，美德蕴藏在失落的梦想中！但是，一旦人们怀疑它是一种有用的虚构，它的力量就会明显消失。

那些失去对他的控制的人，明显地失去了力量和生命的源泉。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是开明者和解放者也会遭受损失。我们的眼睛不能被雪莱、戈德温和拜伦的怀疑论圈子里的迹象所蒙蔽，也不能被在歌德和乔治-艾略特身上看到的松弛症状所蒙蔽。如果这些迹象在强者身上显现出来，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如果基督教失去了它真正的历史性和影响力，在普通大众中会发生什么。我认为，那些在被信仰时能使人重生的东西，以及那些在被虚无或怀疑所消解时会使人丧失斗志的东西，不可能是虚假的。可以肯定的是，真实的东西与有益的东西，与创造美德和圣洁品格的东西是一体的。即使你对事实的某些细节有误解，但当你植根于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时，你就接近了真理的中心点。

就真理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而言，品格是对真理的最终世俗检验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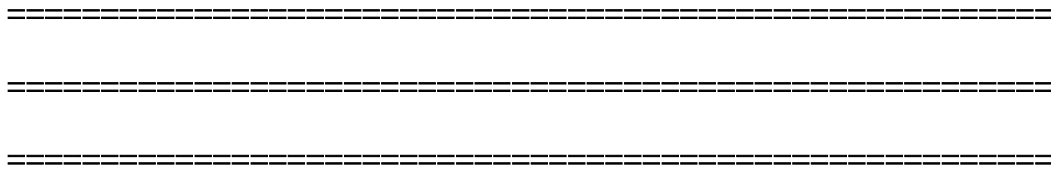
对于基督教来说，这种衡量标准是不是有些危险，因为在苍白善良、志趣高尚的不信教者之中，难道就没有好人吗？越多越好！在任何宗教之外的人性和生活中，肯定也有善良的因素。然而，在我们文化之中，大多数不信教者中的佼佼者，他们身上最美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基督教伦理和影响，他们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从一出生就受到了基督教伦理和影响。赫胥黎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孔德和乔治-艾略特从“基督摹仿论”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身上都流淌着古老信仰的血脉。基督教的原则和影响融入了他们和我们的生活，就像撒克逊语是我们习惯使用的语言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种族所吃的基督教的饼的力量下，我们和他们也许能够在旷野中禁食四十天四十夜，并且仍然表现出一些古老的美德和精力。将基督教道德融入血液需要很长时间，而将它带出血液也需要很长时间。单个的好的不信教者，就像单个的坏的教徒一样，并不能最终衡量他们所信奉的东西。否定——任何不信——永远不会产生积极的收获；它可以筛选和净化错谬的信仰，但要产生积极的品格，就必须对真理有积极的信念。而且（正如我们在自己的工作经验中发现的那样），只有当我们处于最佳状态时，我们才会相信最好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我们处于最佳状态时所看到的最清晰的东西为依据，而不是以我们在智力低落时暗自思索的东西为依据！

女士们，先生们——演讲者提到的许多观点都是如此快速地阐述，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再仔细阅读一遍。在我们人生的不同时期，在我们思想观点的不同阶段，基督教证据的不同方面会对我们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我非常确信，在我们的一生中，有一种证据，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它永远不会停止对我们产生强大的影响，那就是我们对我们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的记忆。今晚，我想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试着想想那些最优秀的人，回忆一下我们所能回忆起的我们所认识的最优秀的男男女女。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父母。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他们是如何在各种灾难和麻烦中逐渐克服弱点、失败和实际过失的，然后再反思，我们就会在与我们有关的问题上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在我们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中，基督教真理的某些部分，无论如何，是他们生活的动力。诚然，在我们的经历中，正如讲师所说，我们可以回忆起优秀的怀疑论者的经历，但我们对这些人了解得越多——我可不想贬低他们——我们对他们的内在历史和先辈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了解到他们受到了早期基督教环境的持久影响。

除了对我们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的这种反思之外，随着我们在生活中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接近生活的终点，这种反思就越多——我们就会回想起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就会逐渐发现，只要我们遵循、只要我们真正吸收了我们所珍视的基督教的原则，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令人满意，或者，我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不令人满意。因此，从我们所认识的那些人的经历和我们

自己的经历中，我们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越来越深信，基督教真实性的所有证据中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好人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带给我们的证据。这是我今晚要谈的唯一看法，因为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集中精力来看待基督教的这两种证据。



唯物主义还是基督教？

作者：G. G. T. MANLEY, M. A. 1

在这篇演讲中，我将首先努力证明，摆在大多数真正渴望信仰某种东西的英国人面前的实际选择是：唯物主义还是基督教；然后，我将给出一些导致我拒绝前者而接受后者的思想原因。

如果说只有唯物主义和基督教可供选择，这似乎是一种大胆的说法。我很清楚，宗教体系的数量很多，但我不认为我们当中会有很大一部分人为了成为墨家或儒家而拒绝基督教。

还有一些人说：“我相信有位格的上帝，但不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个

世界的救世主”。我倾向于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一个很小的群体，比人们有时认为的要小得多。我认为，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立场是不稳定的，必须朝着两个方向之一越走越远。

第一个方向是泛神论。他们很快就会感到，上帝的位格很难与他们的假设相调。他们的假设是，上帝除了通过自然界之外，没有向我们这些上帝的受造物启示过他自己，因此，上帝的位格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单纯的知识教条，而越来越少地成为思想的现实。他们发现，要么他们必须完全放弃在生活中认识上帝的任何尝试，要么他们被迫在周围的自然力量中寻求上帝旨意的表达，而这构成了他们唯一承认的启示。

这个过程的下一步就是将上帝与他在自然界中的表现相提并论，由于没有上帝之爱的突出证据（如基督十字架所提供的证据），整个自然界，无论好坏，尤其是人类的进化，都被认为是上帝的表现。这实际上是泛神论。

在实践中，这种信条的效果与唯物主义如此接近，以至于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单独论述。当然，它避免了后一种信条在哲学上更明显的荒谬，但它在三个主要特征上与唯物主义相似，即否认对与错之间的任何本质区别，否认自由意志的力量，以及完全没有提供任何爱神或爱人的动机。在这些方面针对唯物主义的所有论述同样适用于泛神论——无论如何，在这个国家是这样。

我认为这种人生观并不普遍，我认为大多数不信仰耶稣基督却相信有神的人都倾向于另一个方向，即不可知论。

只要对上帝的信仰是实际而生动的，我们就会渴望在我们的经历中找到上帝之爱的证据。我满怀信心地呼吁所有仍然坚持相信有位格的上帝的人说，难道不是这样吗？对处于这种心态的人来说，基督的呼吁必须具有强大的力量：“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的经验告诉我，那些对上帝保持实际信仰的人，最终一般都会成为基督徒；而那些拒绝基督呼吁的人，也会越来越不相信上帝。

如果上帝不在基督里显现、如果上帝不与自然相联系（即，若上帝不在真实的自然世界与人类历史中向人启示自己），那么对上帝的信仰就会变得模糊不清，越来越淡出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另一种力量是世界上罪恶和苦难的存在。只要我们确信在基督里有救赎和同情，我们就敢于直面罪恶的可怕，甚至敢于奉他的名前去战斗和征服罪恶。但如果没有对基督的信仰，世界的苦难将是多么难以忍受的噩梦！

“上帝怎么会允许这一切发生呢？”这是成百上千的人心中发出的呼喊；面对这个问题，不信仰基督的人就会发现，他的上帝越来越

越抽象，越来越与世界脱节；越来越只是一个哲学玩具，对实际生活毫无帮助。

这个过程在我们周围不断上演。

除了那些自私冷漠导致所有猜测停滞不前的地方，成百上千的纯粹有神论者正在逐渐沦为不可知论者。

现在，我想详细谈谈不可知论者的立场，他们说：“我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基督徒，我不愿意站在任何一边；我只是说：‘我不知道’”。

现在，如果这句话是作为对无知状态的谦卑忏悔而说的，同时又真诚地希望学习研究基督的话语，例如，为了更多地了解上帝——那么，我应该把说这句话的人称为“探究者”，而不是“不可知论者”。目前，数百名有思想的印度人第一次研究基督教，他们的立场就是如此；许多年轻的英国人第一次开始思考，发现到目前为止他的信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他的信仰”，而是他父母的信仰，当他决定自己研究人生的重大问题时，他的立场也是如此。

对于探究者的立场，我只有尊重和同情。但是，这只是一个信仰的阶段，而不是一个休息的地方；这不是一个人们定居的城市，而是一个他们在决定目的地之前暂时休息的分岔路口。

由此，我转而思考作为一种“信条”的不可知论。在这里，对上帝的无知不再被谦卑地承认为一种缺点，而是被当作一种必然，有时甚至被当作一种美德；这正是对于“无知”的神化！这是一种人的立场，他大声说：“上帝是不可知的，没有人能够了解上帝”——唉！他还经常暗地里补充说：“我也不想了解他”。

不可知论作为一种信条

不难看出，这并不构成对问题的拒绝。就像一个人对收税员说：“所得税！为什么，先生，你一定知道这涉及到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必须首先向自己保证，政府是按照他们的说法在花钱，我必须调查所有的部门，等等等等。然后，如果一切都令人满意，没有任何瑕疵，我就会付款”。如果我们能够说服政府，这种立场不是拒绝付款，而是有理由暂停判断，恐怕在这个问题上，不可知论者会大大增加。

基督来到我们身边，不是要求我们交税，而是向我们提供免于罪孽的救赎和永生的恩赐；对他说：“我们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你说差遣你来的上帝”，不是拒绝作出决定，而是决定拒绝他。

我希望明确这一点——不可知论作为一种信条，在这一方面只不过是基督教的拒绝；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向你们引述法国杰出的

作家、不信教者欧内斯特-勒南先生的话。他说：

“撇开所有有争议的批评观点不谈，实际上，没有人怀疑我们的主是以对天父最强烈的爱的关系活着并死在十字架上的，他见证了天父对人类的旨意、爱和恩典。主祷文在这些方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如果再加上《登山宝训》，那么不可知论者拒绝了解的整个看不见的世界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那里，你会看到神圣的天父和万物的创造者与他的受造物建立了个人的关系，聆听他们的祷告，见证他们的行为，关怀他们，奖赏他们。在那里，你会听到由基督亲自主持的未来审判，以及即将揭示的天堂，在天堂里，那些作为天父之子生活的人，那些为了基督而受苦的人，将会得到丰厚的奖赏。如果耶稣基督讲过这样的布道，许下这样的诺言，教导过这样的祷告，那么任何说我们对上帝、对未来的生活、对看不见的世界一无所知的人，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

勒南先生是对的。不可知论者并没有把问题搁置一边，而是决定反对耶稣基督。

这是这个问题的消极方面。但是，对于“不可知论”一词的发明者赫胥黎教授而言，如果有人说这只是一种否定，他就会非常愤怒。当然，他承认有否定的一面，因为在他关于发明这个名称的叙述中，他提到了某个学会的成员，他说：“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实际上是不可知论者。在一件事上，这些善良的人

大多意见一致，而在这件事上，我却与他们大相径庭。他们非常肯定自己已经获得了某种“悟性”，或多或少成功地解决了存在的问题；而我却非常肯定自己没有，而且非常坚信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在这里，他将不可知论定义为单纯的否定，而在另一处，他又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很高兴地把他的“信仰”的积极方面称为一系列命题。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些命题只是包含了生物学中比较著名的定律和假设，你可能会感到惊讶。它们在概念上完全是唯物主义的。奇怪的是，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也以同样的方式把他的信条分为不可知和可知两部分；同样，他把生物学和力学的某些定律归入可知部分：也许赫胥黎只是借鉴了斯宾塞先生早先的著作。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批评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哲学，也不是要说明他先把科学说成是所有分类知识，然后又把它缩小到机械或生物知识、从而忽视历史或哲学的错误推理过程；我的目的是要指出，他对其信条的积极部分的最终分析，就像赫胥黎一样，纯粹是唯物主义的。

在他的《第一原理》中，有一句话被他说成是进化论的最一般的公式，在另一处被他说成是“事物的理论”，是他的“哲学”。他在阐述这个公式时，给了它斜体和引号的双重荣誉。这就是：

“进化是物质的整合和伴随而来的运动的消散；在这一过程中，物质从不确定性的不一致的同质转变为确定的一致而异质，在这一过程中，保留的运动也经历了平行的转变”。

我引用这段话并不是为了取笑他的措辞，因为他的措辞比《物理学原理》的措辞稍差。

我想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足以充分证明我现在的论点：即不可知论的官方支持者所阐述的不可知论，一面是对基督主张的否定，另一面则是对人类知识的纯粹唯物主义表述。

在证明不可知论和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致的之后，我提议将其作为一种人生观加以研究，并以此作为我们的指导原则。

但首先，我必须防止一种可能的误解。我所说的唯物主义并不是指仅仅接受力学定律、物质和力的永恒性、自然选择和遗传。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接受这些，而基督徒一直是受过教育的人中的佼佼者。基督徒和唯物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相信它们背后有一位天父，相信基督对这位天父的启示，而唯物主义者要么否认这一点，要么忽视这一点，将其排除在知识范围之外，转而相信这些物质事实和规律是自足的。

机械学和生物学自足于万物的起源和解释，是现代唯物主义的独

特信条。

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唯物主义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类最永恒的三个需求——从罪恶中得救、道德指导和真理知识？

在我们本性的第一个也是最深切的需求上，即从罪恶和罪的力量中得到拯救，唯物主义就像木头偶像或“自然咨询者”一样，站在那里，如同石头雕像一样哑口无言。除了耶稣基督及其追随者之外，这世上唯一的回答就是“拯救你自己”。阿拉哈巴德的一位年轻印度基督徒，最近被一位神智学家告知：“你不需要救世主，你必须拯救你自己”他回答了一个中肯的问题：“那么，先生，你拯救了自己吗？”但他没有得到回答。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可以从同样的来源中获得怎样的道德指导。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会耽搁大家太久。

赫胥黎教授用两个词概括了他的教导：“咨询自然”。

其他人则为这一建议给出了详尽的理由。他们告诉我们，最初并没有美德这种东西，只有一些动物在为生存而斗争。在它们为保护自己或种族而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某些习惯，比如节制，有利于自我保护，因此被视为美德。因此，低等的物质自然是美德的唯一源泉和来源，最好的道德指导就是“咨询自然”这一忠

告。

我不敢想，如果这些优秀的理论家们曾经想过要践行他们的主张，结果会是怎样。我们看到，白蚁通过无情地消灭挡在它面前的一切来保护自己；我们看到，老鹰选择太弱小或太年轻的动物进行攻击，以保护自己；我们还可能看到，豺狼在黑暗的掩护下进行懦弱而令人作呕的偷窃。唉！所有这些残忍、怯懦、压迫和欺骗的手段，人类都可以在自我保护的事业中看到，而且就这个世界而言，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们应该感谢上帝，赫胥黎教授的道德准则并不是来自他自称相信的低等自然，而是来自他有幸出生并度过一生的基督教社会。

有许多唯物主义者会悲哀地承认，他们对罪人没有任何帮助，对那些想成为圣人的人也没有什么指导；但他们会说：“我们的信条是黑暗的，但它是可悲的真理，我们必须遵循它。”

但是，以物质的名义，一个一贯的唯物主义者为什么要关心真理呢？根据他的理论，真理是什么？如果仅仅是进化论就能说明一切，或者说进化论与人类的知识是相通的，那么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是真理呢，除了知道真理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错觉，是我们称之为推测理性的副产品的一部分，是人类在与低等动物的斗争中为了生存而进化出的超强狡猾所造成的？真理与非真理、理性与愚

蠢、奸诈与诚实，都是在生存斗争中形成的；它们都只是大脑物质某些运动的心理感觉，不是为了改进，而只是为了延续物种。它们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都是盲目原因的盲目结果，我们有机会看到它们，却无力干涉。

因此，唯物主义是智力上的自杀，因为它把真理贬低为有机物或无机物的乞丐元素，而真理就是从有机物或无机物中漫无目的地演化出来的。我们可以再次感谢上帝，有血有肉的唯物主义者比他的信条要好，他往往对真理有着强烈而执着的渴望——这是他所否认的另一个永恒世界发出的声音，也是他内心深处对他所信奉的唯物主义的愚蠢和虚假的证明。

最后，我要谈谈基督教——牛顿、法拉第和开尔文的信仰。只要提到这些名字，就足以证明基督的教义与科学并不背道而驰。基督教是真正的、广泛的科学观的朋友，也是那些唯物主义理论的反对者，这些理论试图让我们相信，在生物学和天文学的狭隘范围之外，不存在任何知识。

唯物主义者就像煤矿里的一个人，他确实得到了珍贵的煤炭，但也坚持认为除了煤矿及其黑暗之外别无其他。他承认煤矿的存在和功用，但他恳求他的朋友接受他的见证，即世界被煤矿的墙壁所束缚，并不相信有一个太阳，尽管太阳的光辉和力量超出了他目前的能力范围、而他仍能感受到它的光辉和力量。

因此，基督教站在唯物主义的对立面，不是作为一个对立的哲学体系，而是作为一个要求被聆听的见证，一个首先由耶稣基督为天父上帝、我们的天父所做的见证，然后由福音书作者、使徒和所有基督徒为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启示所做的见证。

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见证吗？你是否愿意耐心倾听并研究他的主张和我们基督徒的经历？

我试图说明，不可知论和物质主义对这种调查所设置的障碍是人为的，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如果按照其逻辑得出结论，那就意味着道德或精神上的自杀。

科学并没有对基督信仰设置任何障碍。我无意重新讨论科学是否像牛顿和开尔文所认为的那样使人倾向于宗教，或者科学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是哑巴；但我向你们提出这样的主张：耶稣基督和他的追随者的见证确实使人倾向于宗教，天文学或生物学的结论决不会使我们把他的话排除在外。

相信我，如果你们拒绝聆听耶稣基督，那不是因为你们的科学素养，而是你们自己自由意志的刻意选择。对于那些试图聆听耶稣基督和他的追随者所说的一切的人，请允许我补充一句：不要害怕困难。

我们基督徒并不假装已经完全解开了生存之谜。我们有许多困惑，但我们的困难只是所有知识共有的困难。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无知，与我们对物质终极构成的无知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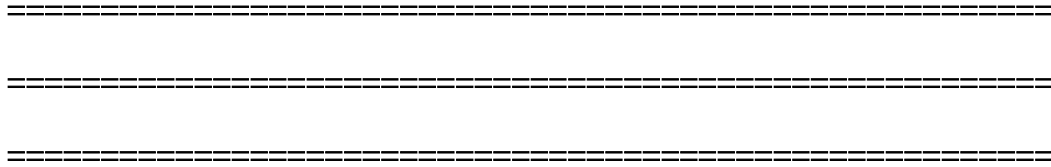
尽管我们承认自己的知识并不完善，但我们确实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为我们的义而复活；我们确实知道，信他的人灵魂得着平安；我们不愿意因为对物质世界的了解而忘记或轻视对精神世界的了解。相反，我们视所有的知识为一体，所有的真理为一体；我们认为所有真理和知识的唯一基础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之父的永恒公义和智慧。

我们不会让低级的存在形式把我们拖到他们的水平——我们宁愿把他们提升到我们的水平；我们不会以最低者评判最高者，而是以最高者评判最低者；我们不相信物质和运动可以解释基督的存在，因为基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物质和运动存在的原因。

最后，请允许我呼吁在座的各位对基督的主张进行研究，并研究出结论。

不要分解它们，而要相信它们，你们会发现它们不会失效；当你们倚靠它们时，你们的信心会得到加强——“*Solvitur ambulando*”。

至于你的谎言，那就去实践吧。说真话，做正确的事；如果在努力的过程中，你发现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你是幸福的，因为就在你感到自己的软弱时，耶稣基督会拉着你的手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演讲者：MR. 奥古斯丁-比尔雷尔，K. C.

关于曼利先生如此清晰有力地向你们阐述的主题，我不想多说什么。在我看来，除非科学愿意承认人类的宗教经验是科学的一部分，否则科学与宗教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今天下午，这位演讲者已经向我们有力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宗教经验的历史与人类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尽管它无法像外在事物那样得到证明和演示，但它以自己的方式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说服力。因此，宗教必须始终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因此，它必须始终受到“那不是我的经验”的反驳。它无法被摆脱，无法被质疑，也无法被强加给任何不受其影响的人。即使人从死里复活，也不能证明启示的真实性或道德性。据我们所知，（在不信者看来），全能的上帝可能是一个不道德的上帝；他用神迹强制人们接受他希望人类接受的信条，并不能证明启示的道德性，而只能证明造物主的全

能。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思想范围内，自己决定一个真理是否符合他的本性；是否能使他变得正直；是否有助于他的人生观、人生道路以及他与同类的关系；因此，我们现在收集了大量的宗教经验。我们国家就有，我毫不怀疑曼利先生在印度西北部省份也能找到。人们有他们的宗教经验；这就是他们必须诉诸的见证，以支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因此，基督教的辩护者不得不提出所谓的个人诉求。他们无法用显微镜来观察任何事物；他们无法用黑板上的数字来计算任何人灵魂的救赎；因此，他们只能诉诸经验。因此，他们（不信者）的回答也是“那不是我的经验”。然而，他们身后有几个世纪，他们面前也有几个世纪。有一点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在有记载的时间的尽头，男人和女人在处理这些未来的巨大问题时，在处理生命的巨大奥秘和死亡的确定性时，会发现——不管科学的教条是什么，不管科学的真理和证明是什么——他们以后会发现，就像曼利先生今天发现的那样，诉诸于人类心灵的证据。

=====

=====

=====

复活的一些证据

作者：C. C. W. WILSON, M. A.

这篇演讲的目的是阐述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些证据。在这短短的篇幅里，我们并不试图全面完整地证明这一伟大的事实，而只是提出一些想法，使我们有可能合理地相信这一事实。一位伟大的作家曾说过，复活是历史上最确凿的事实之一；我们相信这是真的，因此我们打算研究一下使我们相信这一事实的部分证据。使徒书作者将基督教的真理建立在（基督）复活这一伟大奇迹之上（哥林多前书 xv. 14）。

如果复活是一个事实，那么所有其他的神迹都会随之而来；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再多的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他就是基督。现代怀疑论已经掌握了这一真理。它拒绝承认这一事实，但承认对复活的信仰是基督教的主要动力，对推进基督教事业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因此，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让我们来研究其中的一些观点。

有人认为，最初的教师是冒牌货，他们明知基督没有复活，却说他复活了。

帕利在他的《证据》中说明了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他们会有什么动机呢？难道人们会为了一个明知是谎言的故事而自愿忍受贫穷、无尽的苦难和痛苦的死亡吗？至少，我们对他们生活的了解证明，他们是诚实的人。

理性主义者提出的另一种理论简述如下。基督并没有真正死去。他在十字架上只呆了六个小时，就陷入了死亡般的昏迷。他在坟墓中恢复过来，走出来，被门徒看见，远离了敌人，之后安静地死去，这被门徒误认为是复活。

对于这种说法有几种反对意见。首先，罗马士兵在钉十字架方面经验丰富，对死亡的症状了如指掌。我们听说他们惊奇地发现耶稣已经死了，这说明他们在耶稣被钉的十字架前集合，当时有一个士兵用长矛刺穿了耶稣的身体，他们不可能被蒙蔽。其次，他的门徒们会不会把一个刚刚从死亡的昏迷中苏醒过来的人误认为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和死亡的征服者呢？他们的确是这样相信的，因为他们所宣讲的就是这个，他们也因此而受苦。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不可能不指责基督或他的门徒们的欺诈行为。如果基督在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时就向他们宣称自己复活了，那么在他们冒着风险宣扬复活的时候，基督自己一定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如果他什么也没说，门徒们只是想象，那么他们一定是后来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如果他像其他人一样生活，就一定有可能追踪到他的生涯。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勒南所持的理论，即门徒们自以为看到了耶稣的异象，并因此教导和宣讲耶稣复活了。在这种理论中，异象纯粹是一种主观现象——一种心理过程。门徒们期待他复活；他们如

此渴望见到他，以至于以为自己看到了他，并将自己的想象力误认为是看到了他们的主人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没有人质疑他们的诚实和真诚，但有人认为，幻觉和想象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热情地宣讲福音。这一理论遭到了一些反对。根据心理学原理，即使是最轻信的人也不会把自己想象中的生物误认为是真实的，除非有一种预感或期望。

福音书的叙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在门徒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这样认为。他们和其他犹太人一样，期待弥赛亚成为地上的大君王，当他们看到他们的主死在十字架上时，所有的希望都离他们而去了。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人说：“我们相信救赎以色列的是他”（《路加福音》二十四 21），这句话可以很好地代表大部分门徒的感受。他们认为一切都失去了，也不指望他会复活。

但有人说祭司们还记得他的预言。为什么门徒们不记得呢？对此，我们的回答是，有罪的良心总是期待最坏的结果，但失去所有希望的人不会轻易期待或接受好消息。同样，就连施特劳斯也承认，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看到这种异象的心理状态。然而，仅仅过了三天，他们就看到了主。此外，所有的显现都是在四十天内结束的，根据这一理论，显现应该持续更长时间。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基督死了但没有复活，那么他的身体变成了什么？在东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尸体也不会无法辨

认，因为钉痕仍然清晰可见。如果（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找到尸体，他们为什么不出示呢？如果是门徒们偷了尸体，那么这个秘密一定会被很多人知道，而且肯定会泄露出去；即使没有，我们也必须指控他们欺诈。基督教竟然建立在几个将自己的幻想误认为事实的轻信渔民的妄想之上，这简直比基督教本身还要伟大。

Kein 提出的另一种理论认为，我们的主死在十字架上，但他的身体并没有复活。然而，这些显现并不纯粹是主观的，而是有客观原因的。换句话说，耶稣荣耀的灵魂产生了显现，向他的追随者证明他仍然活着。这些都被门徒们误认为是身体的显现。这种理论超出了科学和历史所教导的范围，也不比正统观点更容易被接受。认为基督虽然可以向他的门徒传递信息，但却不能给他们正确的印象是荒谬的。他当然应该告诉他们他的灵与上帝同在，而他们收到的信息却是他的身体从坟墓中复活了。

因此，我们在仔细研究后发现，一个又一个理论被打破，我们不得不承认，最令人满意的解释就是福音书中的记载。然而，最有力的证据不是福音书，而是圣保罗。没有人否认圣保罗生平的一般事实，甚至最严厉的德国批评学派也承认他的四封书信，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和《加拉太书》的真实性。因此，我们的优势在于，即使是我们的对手也没有提出异议。圣保罗毫无疑问看到了复活的基督（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 9 节）。要么是真的，要么是错觉。显然，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

他没有任何期待或预感，在给加拉太人的书信第一章中，他提到了他皈依前与皈依后的截然不同，并将其归因于他所看到的异象。

但是，我们的反对者说，圣保罗是一个热情和容易激动的人。施特劳斯认为，圣保罗肉体上的刺无疑是癫痫，异象就是这种病症的表现。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 7 节中，圣保罗区分了他的幻觉和肉体上的刺，并明确指出肉体上的刺是为了避免他被幻觉过分夸大。

再者，虚幻的幻觉能解释生命中如此显著的变化吗？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保罗）袖手旁观，对他的英勇行为无动于衷。他曾极力迫害基督徒，“极其疯狂地反对他们”，然后他自己却突然出人意料地成为耶稣的忠实追随者，成为他曾经鄙视的老师的门徒。

从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我们间接地得到了许多积极的证据。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圣保罗宣称与其他使徒平等，为自己的教导辩护。他们没有质疑他的说法，而是承认他见过复活的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中，他列举了基督复活后的各种显现，每个人都承认福音书的日期比这封书信晚，所以他不可能是抄写的。在这里，他向他的读者提出挑战，要求他们亲自验证这一事实，因为基督曾向五百个弟兄显现过，其中大部分人还活着。必须记住，他是写给一个非常挑剔和怀疑的群体的，因此在使用这

些事实进行论证之前，他自然会非常确定这些事实。此外，这封书信的全部教导都以复活为基础。它是书信道德的基础（林前五 3、17 等），是书信真实性的证明（林前十六 4 等），也是其充满希望的重要原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20 节）。

接下来我们来看基督复活后的话语。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这些话是谁说的？如果它们是普通犹太人思想的产物，我们自然会认为它们带有一些犹太人理想的痕迹，比如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的那两个人的话（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 21 节）。但是，这些话并不狭隘、偏执和局限，而是所有话语中最伟大的话语，不仅没有低于耶稣基督其他话语的标准，反而为所有话语加冕。不只是犹太，而是整个世界，都是行动的领域：“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基督徒主日的存在为复活提供了另一个见证。当犹太人必须在守犹太安息日和守一周的第一天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选择了后者。起初，基督徒们两个日子都守，但当犹太基督徒和旧犹太教信仰的支持者发生大分裂时，基督徒们放弃了守安息日，即有着三千年习俗的第七日，而把一周的第一天献给了对上帝的敬拜。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在这一天复活，在这一天向门徒显现，从而为他们标明了这一天是感恩和赞美的特殊日子。而在一千八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一天也见证了这一伟大的事实。

尽管遭受迫害、反对和压迫，但基督教会各个时代的存在都清楚地表明，它不可能建立在谎言之上。它的进步和扩展，尤其是在现代，宣告了福音信息的真理，而人们生活的改变也充分说明了它的力量。毕竟，结果才是检验真伪的最可靠标准，而从罪恶的生活中复活，过上公义的生活，则为基督复活的事实增添了见证。

最后，还有一个证据与前面提到的证据不同，那就是它能够任何一个人身上进行实验验证。这并不容易解释。不了解的人几乎不可能理解它的真实性和力量。也许最好的解释是这样的。科学家发明了一种理论，经过反复试验，发现它总是正确的，于是他就承认他的理论是事实。同样，根据基督教理论行事的人，也会以更明确的方式认识到复活的事实。“凡行.....的，就必晓得”，这是使徒圣约翰经常重复的呐喊，而这不过是主的回声：“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
=====
=====

总结

亨斯洛教授的演讲是关于当今的理性主义，特别是达尔文主义。

他在讲话中指出了自然选择在现代不信仰中的突出作用，以及达尔文是现代自然选择观点的权威这一假设的虚假性。在指出现代知识（如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有多少是归纳参考而非观察和实验之后，教授引用了某些现代作家的例子，他们“胜过达尔文”，试图将自然选择的结果归因于“盲目和无意识的机构”。他指出，这与达尔文本人对世界进化的观点是相悖的——“我们的大脑拒绝接受那一连串事件是盲目偶然的結果”。进化论作为一种学说，与达尔文主义强调的自然选择，特别是与现代使用的自然选择这一术语不同，它已成为一种争议，讲师接着描述并讨论了自然选择。他认为自然选择只是一个登记器，而绝不是进化论所包含的出现和消失的原因；虽然他引用达尔文的话说，达尔文与他的现代追随者在这一点上基本一致，但他指出了他认为达尔文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的两个错误：（1）将结构或形式引入生存问题，（2）认为“个体差异”是“偶然的”。他将这些错误归因于达尔文的观察仅限于家养的动物和植物。教授重申了达尔文对无神论推论的否认，并指出达尔文认为必须重视环境，他描述了他所谓的“真正的达尔文主义”，即：（1）变异性，但没有不确定的结果；（2）直接性或对环境的反应能力。然后，他试图说明新的适应论证是如何取代旧的设计论证的，以及“直接性”的大量证据即使不能证明造物主的直接性，至少也必须允许普通的归纳推理过程的进入，在归纳推理过程的指导下，我们会被引向明确的有神论信仰。开尔文勋爵在感谢讲师时说，“科学肯定了创造的力量”，亨斯洛教授对此进行了评论。

韦斯院长在第二篇演讲中论述了《创世纪》。他从创世记公认的统一设计出发，指出创世记展示了上帝与世界和人类的关系，并追溯了创世记的内容，从创世故事到被选中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他指出，这些内容得到了现代知识的证实，并强调（a）《创世记》第一章与现代科学成果的显著接近，以及与多神教巴比伦神话的同样显著的不同。他驳斥了《创世记》一书取材于巴比伦神话的观点。他引用培根的话，认为道德状况正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他似乎将堕落的故事视为寓言与历史的结合。他展示了（b）早期章节是如何让每一个犹太教和基督教儿童了解早期文明的兴起和进步，这些早期信息迄今为止还无法获得，但现在却被美索不达米亚的发现所证实。在谈到父系叙事（c）时，他首先提请人们注意历史是如何证明被选中的民族作为人类祝福的渠道的预定功能的，并在这方面坚持认为，不仅一神论和启示，而且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独特特征的盟约关系都是极其重要的。他利用保留下来的同时代著作的发现来证明对叙述的历史性的信仰是正确的，并谴责对编纂的几个来源的辨别的重视，认为这与作者伟大的道德目的无关。

威尔士先生的演讲开篇提到了我们与基督教相遇的三种方式——通过著作、传统环境和个人经历，并提到了詹姆斯教授的标准——直接光辉和道德帮助。在应用前者时，他简要地谈到了《福音书》中基督形象自我验证特性，并指出了道德本性要求的逻辑重要

性，同时引用了大学学院首批女学生之一爱伦-沃森（Ellen Watson）的著名案例。他指出，道德标准本身就是基督教的结果。

他还引用了许多非基督徒作者的观点，说明基督教在欧洲进步故事和传教成就中的集体影响。他区分了基督教和官方教会组织。他承认当前的社会腐败，然而，少数基督徒的强烈抗议是福音的正义的有力见证。即使不承认基督教是道德进步的原因，而只承认它是文明的伴生物，它的价值也会因此得到保证，失去它的瓦解效应甚至会使不信者不愿放弃对它的公开认可。讲师认为，集体经验是一种巨大的证据，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结果都是不变的。在谈到个人经历时，讲师指出，这些现象的数量、性质和持续性是基督教关于永活基督的能力和真实性的结论所依据的数据之一。在谈到非基督教的解释时，讲师驳斥了（1）医学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同样可以解释不信的现象，因此也回答了自己的问题；（2）个人任性理论，这种理论被数据的持久性、恒定性和普遍性所驳斥；（3）潜意识自我爆发理论，这种理论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了一步，并没有给出动力本身的秘密；（4）提高伦理标准论，因为这在异教国家是不存在的，在我们今天也无力实施；（5）利用基本情感和激情的心弦论，因为现代现实主义作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揭露了他们无法治愈的东西；（6）仅仅体现“故事中的真理”就能触动情感论，因为虚构的“真理”并不能触动情感。（7）最后一种理论认为，是理想化的基督在故事中没有任何必然的现实性的情况下拯救了人们；——因为历史上既没有时间让

理想化的过程发生，也没有理想在对故事的信仰失败时发挥作用；以其崇高著作而闻名的怀疑论者的道德残骸就是这种情况趋势的例证。有人质疑许多不信主的人的高尚生活推翻了永活基督的主张，对此，演讲者在承认福音之外还有许多美好事物的同时，指出了这些生活所源于的基督教环境和遗传，并坚持认为，如同个别事例不足以证明不信主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一样，——需要普遍的尺度来检验。然后肯定了基督教的结论。

曼利先生在发言中将基督教与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其他历史体系被排除在外。首先考察了非基督教有神论者的立场，肯定了他的立场，迫使他向两个方向选择其一：要么，在缺乏特殊启示的情况下，在自然和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寻求道德指引，追随一种在理论上可能是泛神论但在实践中是唯物主义的体系；因为其普遍性是非道德性的，而且这两种体系都否认终极的道德区分和自由意志，缺乏足够的动力；要么（2）更为常见的是，在自称的不可知论中寻求庇护；因为总体而言，对上帝的生动感知会逐渐引向基督，所以拒绝基督就成了否认对上帝的任何充分认识。对世界的罪恶和悲哀进行无基督的思考也会导致不可知论。